



孔子



第一輯

民族偉人



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歷代名賢 孔子
故事集第一輯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運費)

主編者 潘公展·印維康
編著者 黎東方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羊子嘴一八號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經售處 中華書局
中正開明書局
各地分支局店

重慶總經售 文信書局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渝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0001-6000

6001-8000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第一輯

民族偉人

孔

子

黎東方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作者小傳

黎東方先生，字次青，現年卅九歲，河南襄陽人。少受業於梁任公先生，專攻史學。後入巴黎大學，從卡諾波（Charles Seignobos）先生治史學方法，從馬諾埃（Albert Mathiez）先生治法國革命史，得有文學博士學位，並膺最榮譽記名（'Mention Très Honorable'）。壬申歸國，專治中國古史，歷時十載，成「中國歷史通論」——「遠古」、
「春秋戰國」兩篇（均商務出版）。歷任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已刊著作除前述外，計有：「世界聯邦論」（法文本，巴黎西來書店 Recueil Sirey）、「法國革命比烈二邦志士記」（法文本，巴黎齊夫書店 Juvé en Cie）、「希臘城邦」（商務）、
「風俗科學與倫理學」（商務）、
「從氏族到帝國」（商務）、
「先秦史」（商務）；譯有施亨氏「歷史唯物論批評」（獨立）及「歷史之科學與哲學」（商務）等，均傳誦一時。本書係作者本照梁任公先生之理想，根據左傳、學、庸、檀弓、禮運等書作傳，力矯史記孔子世家及今本孔子家語之闕誤，在我國學術界尙爲創舉。現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秘書，兼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委員會常務委員。

121123
S575
35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自由擺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算，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 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 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 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專源於優良的

國家圖書館



003194228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目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潛化而成為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為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鑲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道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昇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種，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紮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遠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湮沒，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弁言

要研究孔子的生平，史記「孔子世家」與今本「孔子家語」均不可靠，崔述的「洙泗考信錄」，又有些懷疑過分與辯護過分的地方。因此，梁任公先生便希望能有一本完全以左傳前十五篇、論語及禮記中的學、庸、檀弓、禮運等篇為依據的孔子傳。我這本稿子，雖則盡了我的最大努力，但究竟是限於我的學識與寫文章的技巧，怕不能告慰梁先生於泉下。我很感謝潘公展先生，若非他熱心贊助中國史學會，並且以這一套傳記叢輯來督責同人，我也許要繼續畏懼寫撰此傳之難而始終不敢執筆。今年的八月二十七日，我曾經有機會參加疏附的各界紀念孔子大會，作了一番關於孔子學說的演講，這對於本書第七、八、九三章的內容結構上，實有很大的幫助。

著者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於莎車旅次

附

孔子

孔子的弟子

……

……

……

……

……

……

……

……

……

……

……

……

……

……

……

九一

孟子

……

……

……

……

……

……

……

……

……

……

……

……

……

……

……

……

九七

荀子

……

……

……

……

……

……

……

……

……

……

……

……

……

……

……

……

一〇三



二

孔子

第一章 孔子以前



孔子以前，中國已經有過很長的歷史。一般說來，中國的歷史共有五千年左右，在孔子以前，剛好有二千五百年；在孔子以後，直到現在，剛好也是二千五百年，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二年，今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合起來，是二千四百九十五年，與二千五百年相差不遠。

就整個的中國歷史來說，孔子還不能算作一位上古的人；我們似乎僅僅可以說他是一位中古的人，甚至連古字都用不上，因為他的學說，到今天還是很新鮮；他的思想到今天還是中國多數人所贊同的思想；他在我們的心目中，簡直佔有高於任何一個近代哲學家所

估的地位；我們尊奉他，如同尊奉一個活着的老師一樣。他差不多是一個現代的人。他的確是不朽了。

對他以前的二千五百年來說，他是集大成；對他以後的二千五百年來說，他是百世師。讓我們在這裏本書開始的第一章中，先就「集大成」三字來說明；等到最後，在本書結尾的一章，再就「百世師」三字，加以說明。

集大成：他是如何集合了古聖先賢的學說與教訓，結束了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的歷史呢？我們先要研究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的歷史究竟怎樣，古聖先賢的學說與教訓是些什麼，才能進一步明瞭孔子的成就。

堯舜所行的制度，是公天下。所謂公天下，是帝位不傳於子而傳於賢。堯不傳位於自己的兒子丹朱而傳給舜，舜不傳位於自己的兒子商均而傳給禹，這都是不以天下為一姓一氏之私，把帝位看成一種「公器」。在堯舜二人看來，帝位是一種責任，一種義務，而不是一種權利。

那時候，中國還是一個部落社會。每一部落，自有其世傳的君長。許多的部落結為同盟，共同擁戴一個盟長。帝堯帝舜便是前後兩任的盟長。帝堯是陶唐氏；帝舜是有虞氏；他們分別以本部落的氏長的資格，充當中原同盟的盟長。所以帝堯雖則傳了帝位給舜，他自己的陶唐氏部落依然繼續下去，由丹朱以次的子孫代代相傳。帝舜於傳位給禹以後，有虞氏部落也同樣地繼續存在，由商均以次的子孫代代相傳。

人類社會在最初的時候原是一盤散沙。當舊石器時代開始，人類渾渾噩噩，不知道何謂組織。其後知道有母，才有所謂母系傳統的氏族，再其後知道有父，才有所謂父系傳統的氏族。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同盟，中間不知經過若干次的流血與混血，若干次的戰爭與婚姻。等到短期的同盟，演進為長期的同盟；在長期的同盟中產生一個核心，某一部落或該部落的君長，以他的領袖才能與領袖道德，換取了羣衆的熱誠擁護，願意奉他為長期的、終身的領袖，尊他為人間的天神（這在西洋叫做「神化」 Apotheosis, deification），稱他為帝（帝字的古義是神），像唐虞時代的人們尊奉帝堯帝舜那樣，中國的社會實在已

經是進步得很了。

再進一步，同盟的基礎更加鞏固，領袖的威權與德望更加擴張，使得各部落的百姓，不僅願意終身擁戴他，而且在他死後仍舊感激不已，要繼續擁戴他的兒子，這就產生了「朝代」，也就是大禹以來家天下的局面。

夏朝從禹開始，到桀結束，一共有十七位君王，前後經過四百七十一年。在這十七位君王之中，起初真正是各部落一致擁戴的共主的，恐怕僅有禹、啓二人。到了第三代，太康，就因為些小的外患，而喪失了領導權至四十年之久。其後少康中興，與其說他是復國，不如說他在事實上另外創立了一個新的朝代。中央的威權，從少康以後，得到較長時期的高漲。然而遇到孔甲，便一蹶不振。最後，桀要專憑武力來鎮壓各邦，「武傷百姓」，就被成湯所領導的反對勢力所推翻了。

成湯是中國歷史上實行革命的第一人。傳說他的始祖是契，為帝舜的司徒，封於商邑。其後就世為夏朝的諸侯。現今我們根據安陽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知道商對夏的關係，

並非諸侯對天子的關係，而是一個盟屬國對盟主國的關係。商國的先君如王悅、王亥，都是稱王的；「契」在世本一書之中，也是寫成玄王。在夏朝的時候，恐怕不僅商國稱王，若干的所謂侯國都是各有其半獨立地位，一律自稱其君為王。其實諸侯一詞，在西周以前，原與羣后二字同義，侯就是后，后就是君。我們倘是沒有忘記，夏朝是剛剛由一大同盟演進為一大邦聯 (Confederation)，就可以恍然於此種各不相下的現象了。

商朝由成湯開始，共有三十一位君王，歷時六百二十九年。這六百二十九年之中，有所謂「五治五亂」，實則治的時候短，亂的時候長；在亂的時候，常常「諸侯莫朝」。但是有一方面，牠比夏朝進步。這就是在下半期，從盤庚定居於殷起，牠不再往來遷徙，不再保存游牧時代的舊習；而且，王室不僅定居，又逐漸擴大了牠直接佔領與統治的地區，「畿領」。到了商朝末年，牠的畿領已經大到如此的程度：使得周公於討平武庚以後，把牠分成魯、衛、宋三國，依然是當時諸侯之中，幅員最大的三國。這三國合起來，北至湯陰，南至太和，東至費縣，西及鄭州。

禹湯二人，在他們當時的德望，比起堯舜來，是否較有遜色，我們在今日已經不得而知，但是他們的事功實在值得我們欽羨。禹治洪水，在外工作八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把當時的江淮河濟四瀆，整理得井井有條；又在渭水盆地與黃河三角洲，開了許多渠道，化水患爲水利，使得多數的人民可以生存。我們到了科學如此發達的二十世紀，關於治河治淮，費了很多年的努力，還不能有若何完美的成就，想起四千一百餘年以前的大禹來，真羞愧得得很。湯之代有天下，與禹異轍，可謂純由武功。但與武力統一迥不相同。他能够做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到處解民倒懸，使得人民扶老攜幼，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王師真不愧爲革命的武力。他能够以一人一生的精力，奠定下商朝六百二十九年的根基，實在不是偶然的。

再其後，便是文武，周朝的文王武王。文王不用干戈，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仍舊以服事殷，是一個不爭地位、愛好和平的領袖。在詩經上，保存有虞芮二國的國君來請文王擔任仲裁的故事；這二國的國君看到文王的德教之隆，周國人民的彬彬有禮，覺到

自己爲了小小的事而發生國際糾紛，未免太慚愧了，便不再請文王仲裁，自動和解而去。從這一段史料我們可以推想到，當時必已有過若干國家，曾經先後請文王作過仲裁。文王雖則身處中國的西隅，事實上已經成了天下嚮往的一個中心。孟子也說，當時的老年人都很願意走到周國來，文王之「善養老者」，已經著名海內。他不但善養老者，實在善養一切的人；結果是天下之欲仕者，皆欲仕於文王之朝，天下之欲耕者，皆欲耕於文王之野；天下之埋怨其君的人，皆欲向文王來訴苦，請文王來替他們報仇。

當時最受人民埋怨的莫如商王紂。文王自己不肯用兵，要留待他的兒子，武王。武王一會諸侯於孟津，不期而遇者八百國，仍舊不肯有所舉動。其後忍無可忍，才「以至仁伐至不仁」，牧野一戰，紂有億兆之人而億兆其心，武王是纔辦三千人，三千人一心，果然獲勝。他在歷史上與成湯齊名，都是弔民伐罪的革命家。易經上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滅紂以後，他並未併吞商國，仍立紂子武庚爲君。可惜他做了天下共主不過七年，便遽爾逝世。

在他逝世以後，武庚就聯合了若干東方之國，向周室反攻，這才引起了更慘烈的一次戰爭。在周公的領導之下，周室終於獲勝；爲了一勞永逸起見，索性把商國的國土（也就是商王室的畿領）分成三片：分封給文王之子康叔、周公之子伯禽、與武庚的伯父微子。除了這、衛、魯、宋三國以外，周公又建置了不少的同姓之國與異姓之國。這些新封的國家，分佈於天下各地；一方面作爲周室在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屏藩，一方面在文化上又作爲傳播禮教的若干中心。於是中國經過八百年的陶冶，便慢慢化爲一爐，形成一致的典型，達到車同軌、書同文的境界。

周公制有周禮。這周禮今已失傳，非現行的周官一書所可代表。但周禮的內容，賴有左傳及若干篇禮記，我們還可以知道一個大概。牠包含今人所謂憲法、禮制、與公私生活的規律。舉例來說，諸侯應該怎樣事奉天子，應該多少時候來到王京一次，彼此應該在什麼時候互相聘問一次，天子應該祭什麼，諸侯應該祭什麼，大夫與士庶人應該祭什麼，都一概有明文規定，不得違背。再舉一個較小的例子來說，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得入於羣臣

之家，否則便是「君臣爲諫」，蒙受「非禮」的惡名。

周公所定下的規模，使得居於鎬京的西周中央，極有力量。那時候周室的畿領，東起虎牢（河南鄭州西北），西抵寶雞，南北均有巨嶺，不下千里方圓。財力兵力，均甚充足，因此才能統馭四方，發號施令。牠雖無集權的形式，而實收集權的效果。通計西周三百五十二年之間，大體上可以稱爲小康之局。

是到了犬戎入侵、平王居洛以後，周室才由於喪失渭水盆地大半個畿領，而一蹶不振。諸侯漸漸僭越，不再遵守周公所定的禮法制度。於是侯國與侯國之間，爭戰不已；每一侯國的內部，又迭演公子爭位、大夫竊權的醜劇。甚至在私生活上，也是放縱到了極點，姦邪恣亂，爲前於此時與後於此時任何一個時代所不及。

孔子便是生在這樣的一個春秋時代。

在他以前，值得我們追述的，也就是值得他在當時追懷的，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認爲惟有堯舜揖讓之時，才配得上稱爲理想的大同之治，禹湯以後只是小康而已。但是

時代雖然不同，列聖的人格與用意卻是一樣：因此他也說，「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孔子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他研究了在他以前二千五百年的歷史，獲有不少的心得，不僅留意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事功，尤其服膺列聖的爲人與嘉言懿行，因此才能集其大成，在很早的時候，就博得鄉黨鄰里與國人的稱譽，以爲他是聖人復生。

我們應該知道，在孔子以前，學術與政治是不分的：典籍藏於官府，一個學家必須同時是政治家，沒有離開政治而單獨樹立學術的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中國遠古的政治家，也是中國在遠古時期所僅有的藝術家，而集其大成的便是孔子。

第二章 春秋時代



秋時代共有二百四十餘年，差不多以春秋一書的起訖爲起訖：從魯隱公元年開始，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爲止。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春秋記載亦終於魯哀公十六年。

魯隱公的元年，相當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廣義的春秋時代該從周平王元年算起，到春秋記載終止的一年，亦即是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爲止，共有二百九十四年，離三百年不遠（公元前七七〇至公元前四七七）。

那時候，洛陽的王室徒擁虛名，中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地方上是諸侯割據，在每一侯國的內部又有大夫割據。中國分裂成無數的小單位，退步到西周以前，盤庚以前，堯舜以前。各自爲政的若干貴族，成爲事實上的若干國君，互相爭奪，互相仇視。這真是最合於西洋封建一詞定義的一個封建時代。

那時候，差不多年年都有混戰。在春秋的三百年中，戰爭幾乎也有三百次。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就大體說，此語並未過分。每一個侯國，爲了擴充自己的疆界，搶奪鄰國的秋收，或報復一點嫌怨，甚至爲了執政者想洩一點私憤，都不惜兵戎相見，輕動干戈。

十四五個強大諸侯，等於十四五個強大軍閥。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情形，還不足以作爲比照，因爲民國初年軍閥的數目，就能够單獨作戰的來說，尙不足十人。誠然春秋時代戰爭的規模較小，但是年年作戰，處處作戰，也足夠騷擾了。

自從有了五霸，侯國間的情形就好了許多。齊桓晉文以他們的較強武力，鎮壓了若干小國，使得彼此不敢輕於啓釁。在這個意義上，齊桓晉文是值得稱讚的。他們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聚結了一些小國在他們的周圍，領導他們至少在表面上對周室表示尊敬，又領導他們互相扶助，以抵抗當時境外的與雜居於境內的蠻夷戎狄。在蠻夷戎狄之中，最足以爲患的莫如狄人。狄人居於山西中部及東南部，與河北省的中部，常常侵犯中原的各個侯國，甚至滅了邢、衛二國。是撤了齊桓公，這邢、衛兩個侯國，才得恢復起來。因此孔

子曾經說過「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稱之」；又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齊桓公除了恢復邢、衛二國以外，又曾經救燕、戍周。有一次，爲了向楚國示威，他集合了鄭、宋、魯、衛、陳、許、曹、江、黃九國的兵力，南至召陵（河南鄆城）。這是在公元前六五六年，亦即魯僖公四年，齊桓公三十年。

等到齊桓公一死，宋襄公想繼承齊桓公的地位，就遇到楚國的打擊。楚國似乎是始終反對中原建樹一個新的中央的。牠在當時的列國之中，是幅員最大的一個，奄有湖北省的大部份，與河南省的東南。晉文公看清了這一點，便在自己稍有辦法的時候，首先與楚國角力。公元前六三二年，兩軍會於城濮（山東濮縣南），晉文公以甲車七百乘，甲士七千人，進攻楚將子玉所統率的陳、蔡、申、息之兵，及作爲楚王禁衛軍的「二廣」，一戰獲勝，就取得了中原的霸權。

晉文公在種種方面，均與齊桓公不同。孔子說，「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

正」。這似乎是指的他們二人對於王室的态度。齊桓公尊王出自本心，晉文公則以尊王爲「取威定霸」的手段。齊桓公對於王室無所要求，並且在禮貌上也說得過去。晉文公則召王於踐土，以諸侯的資格招天王來到會；又向天王請用諸侯所不應該僭用的隧禮，將來在自己的墳墓中設置隧道。

他在能力方面，也許要超過齊桓公。齊桓公一死，齊國就喪失了領導的地位；晉文公卻能於死後令晉國繼續掌握全部或局部的霸權，迄於春秋告終之時。他知人善任，正如齊桓公一樣，但是桓公僅有管仲一人，他卻有趙衰、舅犯、先軫等等，能臣甚多。他又知道擴充兵力，把晉國的二軍增爲三軍，又增加三個新軍，事實上有六軍。並且，在他死後留有幾位得力的老臣與老臣之子，以輔佐那位繼承他的晉襄公，不像齊國雖有管仲，而不幸管仲先桓公而死；還有，晉文公的兒子很少，不會演出像桓公死後五公子爭位的長期內亂；這些都是晉國比起齊國較爲幸運的地方，因此晉國霸權能支持得很久。

五霸除了齊桓晉文與不夠格的宋襄公以外，便是秦繆公與楚莊王二人。秦繆公霸有北

洛河以西的地帶，滅國十二，闢地千里，遠在齊桓公的時候，就已經嶄露頭角，而且晉文公也是靠了他的力量，才能回國得位的。不過他的才具，究竟比不上晉文公，所以只能雄踞一方，不能夠得志於中原。晉文公既死，他冀圖經過晉國的南境對河之處，襲取中原核心的鄭國，又遭遇晉襄公予以無情的打擊（從此以後，秦晉由反邦成爲世仇，陸續作戰多次，共有七十二年之久）。

楚莊王所主持的楚國，雖則也是五帝之一的顛頊之後，卻由於距離中原太遠，一向被目爲蠻夷，也自居於蠻夷，而且根本不知道尊重周室的禮制，素來僭稱爲王（僅僅在西周厲王的時候，因爲懼怕厲王的「暴虐」而一度取消王號，到了東周桓王的時候，又重新稱王）。因此，儘管楚莊王也是五霸之一，卻說不到尊土攘夷四字。他用兵力遷走了周畿以內的陸渾之戎，似乎也是攘夷，但跟着就向周室問鼎的輕重；這九鼎是夏禹以來歷代王室傳國之器，楚莊王注意到牠們的大小輕重，野心可想。不過他的爲人，另有其可取之處：力量足以滅鄭，而能接受鄭襄公的肉袒請和；力量也足以滅陳，而於平定了微舒之亂

以後，仍舊讓陳國存在。在知人善任這一點上，他也不亞於齊桓晉文；他用了孫叔敖爲令尹，楚國的內政在當時可稱第一。因此，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於郟邑的地點（河南鄭州之東），他就一戰勝晉，雪了三十五年以前城濮之役楚國的國恥，奪取了中原的霸權。

但是再過二十二年，到了楚共王手中，霸權仍舊爲晉國奪回（是爲鄆陵之戰，鄆陵在河南鄆陵縣西北）。霸權再入於晉國之手以後，在本質上發生變化，尊王攘夷的內容已不存在，有主義的結合成爲純武力的結合，只是小國畏服大國而已。並且秦國由於不堪晉國的高壓而常與楚國往還，分去了不少晉國所能號召指揮的力量。如此的情形維持到公元前五四六年，便有宋國大夫向戌所發起的弭兵運動。

這是一種國際和平會議，參加的有十四國，除了秦國以外，其餘的十三國均有國君或代表到會；晉楚齊鄭宋魯衛陳蔡許曹矰滕。會議的議定書，是列國從此應不以兵戎相見。霸權在事實上成爲晉、楚二國分享，晉爲北方的盟主，楚爲南方的盟主（向戌使得一向被目爲蠻夷的楚國，與周室宗支的晉國，共掌領導列國之權，這是漢朝的公羊家所極不贊成

的。他們認為向戌是一個罪人。

這一次「不以訴諸武力為國策」的互相約定，就魯衛鄭曹四國而言，維持了足有四十年之久。但在這四十年期間，楚國卻一度滅了和牠共同簽字於非戰公約的陳蔡二國；晉國也乘着中原無事之時，掃蕩了狄人的殘餘（狄人大部份已經在五九一年被晉國擊潰了）。

孔子生於向戌弭兵以內的六年。所以在孔子三十四歲以前，中原是大體無事。其後齊魯之間雖不時有些小規模的磨擦，而就當時的天下大勢而言，已經由晉楚之間的對壘，轉換為吳楚之間的對壘。吳國號稱為周文王的大伯父秦伯之後，一向僻處於現在的甌、蘇州，與中原的往來極少，而且從國君起就早已斷髮文身，隨服了當地土人的習俗。這就難怪中原諸國也一向認吳國為蠻夷，如同對於楚國一般。肯提攜吳國的只有晉國，這由於在秦晉七十年陸續戰爭的期間，秦國常常勾結楚國來與晉國為難，晉國就想到怎樣來扶植這楚國東鄰的吳國了。於是派了一位巫臣來教育吳國的君臣，尤其是教他們如何作戰，以中原最進步的武器與戰術來作戰。這就惹起了楚國的注意，在楚靈王的時候出兵三次，在楚

平王的時候又出兵兩次，然而五次均不曾能够消滅吳國，到了最後的一次，第五次，反而戰敗。平王既死，昭王即位，吳國的軍隊於伍子胥的嚮導之下，一度佔領了楚國的都城；湖北江陵縣的郢都。倘若沒有申包胥從秦國請來救兵，楚國也許就這樣的亡國了。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五〇六年，孔子四十七歲的時候。再過十年，吳王闔廬伐越，爲越王句踐所敗，傷指而死。又過兩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大破越國，居句踐於會稽。這時候，孔子五十九歲。到了孔子六十六歲的時候，吳王夫差伐魯，魯哀公與吳締結城下之盟，魯國便成爲吳國的盟屬。五年以後，吳、晉二國會諸侯於河南封丘縣的黃池，約定吳、晉二國輪爲盟主，但這一次卻是以吳國來先執牛耳。

吳國是要繼續橫行九年以後，才被復興的越國取而代之的，那時候，已經不是春秋時代，而入於戰國時代了。

這便是孔子一生及其以前共總三百年左右的國際大勢。讓我們進一步研究當時孔子所居的魯國，其內部情形的演變如何。

第三章 魯國



記說，周武王滅紂以後，封周公於魯。這一段記載是錯誤的。在武王滅紂的時候，東方還不曾入於周室的範圍。是到了紂子武庚率領東方諸國，在周成王的時候，大舉反周，成王命周公削平武庚及附和武庚的諸侯，包括那居於曲阜的奄國，這才把武力推進到山東南部魯國的所在地來。於是成王就命令周公，把他的長子伯禽封爲魯侯。周公的次子及次子的苗裔，仍居京師或陪都，世襲周公的公爵，至少一直到了厲王的時候。

何以說，始封於魯，是伯禽，不是周公呢？這是有詩經的魯頌作爲證明的。闕宮一篇上說：「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爲周室輔」。王是成王，叔父是周公，元子便是伯禽。

在西周時代，魯國似乎還沒有自修的國史，我們僅能依據漢書律歷志，略知魯國伯禽以後的世系及其在位的年數。比較重要的史實，僅有史記魯世家所記載的：魯武公準子朝周，周平王命令他廢長立少，廢去太子括而立公子戲，其後公子戲立為懿公，國人不服，引起了一次內亂。再其後，經過孝公與魯君伯御，便是入於東周時代的魯惠公了。

魯國的人們一向很看重嫡庶的觀念。在惠公既死以後，他的庶子隱公即位，始終未敢以正式的國君自居，不肯自立己子為繼位的太子，說遲早要把位置傳給父親的嫡子，自己的異母弟桓公。不幸這魯桓公惑於讒言，卻中途把隱公暗殺了。

桓公自己也得不着好死。他的夫人是齊國的姑娘，原來與齊襄公有染。在桓公陪着夫人回齊旅行的時候，就死於齊襄公所派遣的刺客彭生之手。

桓公有四個兒子：長子是莊公，莊公的後裔使世為魯國之君。次子是公子慶父，他的後代稱為仲孫氏。三子是公子牙，後代叫叔孫氏。四子是公子友，後代叫季孫氏。我們先

莊公在春秋時代魯國的列君之中，可以推爲數一數二的人物。他率領了一千乘的甲車，三萬名的士兵，支持齊桓公尊王攘夷的運動。在詩經上，有專門讚美他的辭句。

他有三個兒子，長子太子般與次子閔公，均爲他的弟弟公子慶父所弑。三子僖公，爲他的另一弟弟公子友所立。公子友，是先誅了公子慶父，才能夠扶立僖公的。僖公與晉文公同時。

僖公有兩個兒子，長子文公，次子公子遂，即東門襄仲。在文公死後，東門襄仲也殺了文公的長子與次子，扶立文公的第三子宣公。在宣公九年的時候，國人就逐走東門襄仲的兒子歸父，及東門氏一家。

這一次領導國人來逐走東門氏的，正是那誅討慶父的公子友的孫子，叫做季孫行父，後世稱他爲季文子。這季文子，便是論語上所常常提起的：喜歡「三思而後行」的一位賢人。孔子認爲他有點賢得過分，凡事何必三思，只要再思即可，把一件事利害得失的兩方面權衡一下就可以了。季文子思慮得太多，反而過猶不及，有時候不免把事情做錯了。他

遂走了東門氏，成爲魯宣公的得力輔佐；宣公死後，他又陸續扶立了宣公的兒子成公，及成公的兒子襄公，可說是三朝元老。但是也在他執政的時候，所謂三桓的力量才坐大起來，所以他既是魯國的功臣，又是魯國的罪人。

三桓是誰呢？便是那桓公的三位公子之後：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桓雖則也是國君之後，但是一代代地傳下來，已經成爲宣公以來國君的遠房本家，與宣公僅爲同高祖的關係（與莊公同父，與僖公同祖，與文公同曾祖）。到了成公以後，拿俗語來說，已經出了五服。

以遠房本家的資格來干涉政治、主持政治，就宗法的立場來看，是不很合乎規定的。周代的宗法講究親親，每代的國君常以自己的兄弟伯叔及堂房兄弟作爲輔佐，分任卿大夫的要職。因此，差不多換一代國君，就換一班輔佐。這樣，所謂世卿就不容易發生。有了世卿，那便成了國君不能任用近房本家，必須坐視遠房本家來世掌國政，成爲尾大不掉的局面。

魯國之有世卿，不自三桓開始。臧武仲、臧文仲一家，在春秋初年，就曾經以世卿的資格遭受譏評，終於失敗。但是三桓做了世卿以後，三家互相扶助，以共同把持魯國的政權，其罪惡卻遠非臧氏所能比擬。

這個責任，要由季文子來擔負。雖則他本人的私德極好，對於魯國的公室也十分忠實，但是他爲了排除文公的弟弟東門襄仲及東門氏一家，爲了防免宣公、成公、襄公的近房兄弟叔伯與他爲難，他在策略上採取了拉攏與自己同屬遠房、同爲桓公之後的仲孫氏與叔孫氏，以共掌大政，使得其後三桓永久分割魯國的政權與魯國的領土，不能不算是一步錯誤。

三桓從此世襲了魯國的司徒司馬司空，輪掌國政。在季文子死的時候，他用自己的力量，叫仲孫氏的仲孫蔑來繼承他，作爲魯襄公的最大輔佐。這仲孫蔑後世稱爲孟獻子，原非壞人，而且是一位賢人。禮記大學一篇，引過孟獻子說過的話：「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一個養了四匹馬的人家，不應該再訂較家裏有雞多少，有豬

多少。一個可以在冬天儲冰、自備冰窖的很富的人家，就不應該再養牛養羊了。孟獻子的意思說，富人尚且不可以與窮人爭小利，諸侯或政府更不可以和老百姓來爭多嫌少了。國家不能以利為利，當以義為利。他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由此看來，孟獻子確是一位賢人，季文子的選擇並沒有錯。我們責備季文子，是春秋責備賢者，責備他一舉一動所留下來的惡影響，責備他所造成的三桓制度。

孟獻子這一位賢者，也做了一件錯事。他容許季文子的兒子季孫宿把季孫氏的私邑遣上城牆，成爲一個「設防」的城市。這就使得魯國變成了國中有國，喪失了牠的統一了。

孟獻子死後，把大權讓給叔孫氏的叔孫豹，按照季文子所立下的規矩。這叔孫豹後世稱爲叔孫穆子，便夠不上稱爲賢人了。他執政僅有三年，從魯襄公九年到十二年。是在他的手中，魯國分成爲三軍的；把魯國的人民，由春秋初年的二軍編制，改爲三軍編制。以前二軍均由國君於平時徵賦，於戰時直接指揮，從此以後，人民與軍隊便分屬於三桓三家了，國君只能從三家手中領取一些貢賦而已。

叔孫穆子沒有等到死，就讓權於咄咄逼人的季武子（季孫宿）。季武子前後掌政達三十年，從公元前五六一年到五三一年。他把魯國由三軍又改爲二軍，自分一軍，令仲孫、叔孫二家共有一軍。此外，他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一件，便是在襄公逝世的時候，弑殺了繼位的太子野，另立昭公。這昭公是一位知儀而不知禮，到了成年以後「猶有童心」的庸材，季武子取其便於操縱而已。

在季武子死後，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仲孫氏的孟僖子（仲孫釁）不曾輪到，卻由叔孫氏的叔孫昭子（叔孫婁）來繼承，從昭公八年到昭公二十五年。在昭公二十五年的時候，叔孫昭子既死，魯昭公頗想一舉而去三桓，但是失敗了，反而被三桓驅逐，先出奔到晉國，又流亡到齊國，齊景公把他安置在郟城。

季平子（武子之孫，名意如）不僅繼承了叔孫昭子作爲魯國的正卿，實際上是繼承了昭公所留下的君位。那時候，昭公居外共有七年之久，才鬱鬱而終，君位虛懸，季平子名爲正卿，實爲攝政。等到昭公一死，他就扶立昭公的弟弟定公。

到定公五年，季平子逝世，季孫氏的家中也發生了一件報應。陽虎以家臣的資格，劫持季平子的兒子季孫斯（季桓子），而且代替三桓，獨掌魯國的大權。如此的故事，很像在曹氏篡漢以後，又有曹氏的大臣司馬氏來篡奪曹氏的魏朝一樣。

陽虎一共執政了三年之久。那時候孔子的年齡，由四十九歲到五十一歲。陽虎如何器重孔子，以及孔子如何拒絕陽虎的利用，我們留待以後再說。不過陽虎畢竟為三桓的力量所推倒了。跟着便是季桓子當國，到哀公四年為止，共二十年。

季桓子一度請孔子出山，頗表信任，但是孔子的政策未能推行。季桓子死後，由季康子（名肥）繼承，一直到了哀公二十七年才逝世，執政二十三年。在他逝世的時候，魯哀公以為有機可乘，努力排除三桓，結果是步了昭公的後塵，出奔於有山氏。這已經是入於戰國以後的事了。

第四章 孔子的幼年



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這一年，是周靈王的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二年。這一月，是酉月，相當於我們舊曆的八月，因為周朝的歷法，是所謂「建子」，以子月為正月，我們的舊曆是按照夏朝的辦法「建寅」，以寅月為正月，所以周朝的十月，相當於我們舊曆的八月。這一日，是二十一日。周朝的人，不稱今天初一、初二，或十幾、二十幾，而是按照甲子、乙丑、丙寅的順序，不管年月如何，一天一天地排下來的。

孔子所生的地方，是魯國昌平鄉陬邑，在魯國都城的南郊之外，也就是今日曲阜縣的城外。這陬字與鄒字的聲音相同，到了戰國時候，人們索性也寫成鄒字，是魯國的一邑，不是鄰國的都城。孟子也是這個地方的人，所以自稱為「近聖人居」；孟子為魯國的孟氏之後，並非鄰國的人民。

孔子是宋國宗室的旁支，也就是契與成湯的苗裔，何以生在魯國，而且生在陳邑呢？這因為他的父親，是陳邑的邑大夫；從他的曾祖起，就已經搬到魯國來住了。他的曾祖叫做孔防叔；曾祖的曾祖是宋國的大司馬孔父嘉，嘉的高祖弗父何，是宋濬公的兒子。

弗父二字是號，「何」才是名字，當時人們的習慣愛把號寫在前面，名字寫在後面。弗父何姓什麼呢？當然姓子，商朝與宋國的宗室是姓子的。但是春秋及其以前的人，男子稱氏而不稱姓，女子才可以稱姓，例如衛靈公的太太，是宋國國君的女兒，就稱做南子，南字是特別的稱呼，子字是姓。又如鄭武公的太太，是中國國君的小姐，中國的國君姓姜，所以這一位鄭武公的太太便叫做申姜。男子們有氏的稱氏，沒有氏的就單單稱一個名字，或是再加上一個號在前面。至於對別人自稱的時候，那祇能稱名了，不能夠連着氏或號一齊說的。

其實弗父何三字連稱，這是後人的口氣，或許正是孔家的家譜上作如此寫。在弗父何的當時，一定是稱為公子何。他原為宋濬公的長子，可以做太子的，但是濬公把君位傳給

了弟弟鴆公；其後湣公的另一兒子緄祀，弑了鴆公要擁立弗父何，弗父何不肯接受，這公子緄祀就自立了，是爲宋厲公，對於弗父何始終很尊敬。弗父何的兒子叫做公孫周，號宋父，後世稱他爲宋父周。宋父周的兒子叫做世子勝，這世子二字沒有什麼意義，並非宋太子或世子的意思，也許是勝的號叫做「世子」而已。世子勝的兒子叫做正考父，這又把名字放在前面，號反而放在後面了。正考父做了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世的輔佐，以謹慎著名。他是受有三命的爵士，普通的小官受一命，總是說天子或國君在策書上，或是在授勳授官的時候，對他只稱呼名字一次。再大一點的官，就受有二命；到了最大的，可以得到天子九命之榮。例如毛公鼎上，有「王曰父曆」，前後重覆稱了好幾次，便是受有好幾命的意思。這正考父因爲是諸侯之臣，只是一個陪臣，所以得到三命之寵，已經很不容易。但是他越受命得多，卻越恭敬。他自己做了一個鼎，說「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一命的時候，他的頭低下來了；再命的時候，他的身子彎了；三命的時候，他簡直是做了所謂九十度的姿勢了。他繼續說：「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

以餽余口」。——「我即使只敢傍着牆來走，不敢走路的中心，但也沒有人敢來欺負我。所以做人恭敬一點，並沒有壞處。我不過是餬口混混飯吃而已」。其實誰敢惹他，他是宋國的三朝元老，地位與魯國的季文子相伯仲。至於自稱餬口，那真是未免太謙虛了。

他的兒子孔父嘉，位爲宋國的大司馬，也極有權勢，但與同朝的太宰華父督，不能相容，而且由於妻子長得太美，又格外引起了華父督的惡念，結果是遭了華父督的毒手。

孔子嘉生木金父，以木爲名，以金父爲號，木金父生翬夷，這兩人均無若何事蹟可考。翬夷生時叔，時叔是始遷於魯的一人。也許從翬夷起，才自稱爲孔氏的：春秋時代的習慣，除了天子或諸侯特賜土地，所謂「胙土命氏」以外，貴族子弟每每自以祖父之號爲氏。

孔防叔的兒子叫做伯夏，孫子叫做孔紇，號叔梁。孔紇做到了魯國陬邑的邑大夫，頗有膂力，人也勇敢。他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做什麼名字，現已無考，我們僅僅知道這位長子死得很早，留下一個女兒，由孔子主婚，嫁給了南宮适。次子便是孔子了。

孔子的名字叫做丘，號叫做仲尼。相傳孔紇與他的太太在尼山祈禱以後，才生孔子：尼山不大，只是一個丘陵，所以便名孔子爲丘，又因爲是行二，所以號叫仲尼。

孔子按照傳說，是孔紇晚年的兒子，生下不久，也許是在三歲的時候，父親便去世了。孔紇是一位清官，而且好幾代以來祖先都過的流亡生活，所以孔家絕對談不上富有或小康。在孔紇既死以後，孔子便是一個很貧苦的孤兒，全靠他的母親顏氏把他努力教養成人。

歷史上每每有許多做成大事業或求得大學問的人，是出身於貧苦人家，而且從小喪父。這由於他們從小就受了一番別人所未有的磨折，養成一種堅忍與剛毅的心情，到了後來就能够擔當大事，或深研宇宙的祕奧。孔子以外，像岳武穆與我們的總裁，都是少孤而貧苦的。

孔子在他的幼年，沒有機會受到貴族們的教育。他除了母教以外，沒有進過當時的學校。他後來的學問，可以說是全靠自修得來。因此便有人懷疑他是一位「生而知之」，乘

有夙慧的人。他說：「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純由自己追慕古人，努力去迅速研究的。韓愈說，「孔子無常師」，這句話也是對的。他差不多以人人爲師，不恥下問；而且他認爲學問不僅是書本，應以做人的道理爲最重要，所以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

他幾乎是逢人便問，每事必問。在他二十八歲的時候，邾子卽邾國的諸侯，來到魯國上朝，與魯國的大夫叔孫昭子談了一番少皞氏以鳥名官的道理，這與近代的圖騰學說頗爲暗合，便引起了孔子的興趣，就去到邾子那裏，請他指教。有一次，他進入魯國的太廟，太廟中大概在演什麼大典，孔子也是一直叨叨不休地問下去，引起旁邊人的批評，說：「誰說陳邑大夫的兒子懂得禮，他每一件事都要問人，我看他一點禮都沒有學過」。後來有人告訴孔子，孔子說，「太廟所行的大典很複雜，我要問個明白，才免得跑錯了，或站錯了，問了再做，才合乎禮」。他從來認爲求知應該忠實，知道的才說知道，不知道的就

要說不知道。

他家裏很貧寒，不容許他專心求學。他必須有個職業，才能養活母親、自己、和自己的妻與子。因此他就不得不做個小官，低級的公務員。從來有大抱負的人，很少甘心居人籬下，做小職員的。但是在孟子看來，越是抱負大，越不能隨便做大官，倘若萬不得已，爲了家貧親老，那就只可以隱姓埋名，做個守城門的，或是夜裏打更的小吏。爲什麼呢？因爲苟且做了大官，而旅遊旅退，不能實行自己的主張，徒然佔據別人的位置，倒反是一大恥辱。孟子認爲孔子在家貧親老的時候，只做小官，並且不越位而言，不談超乎自己職務的國家大事，是頂對的。

孔子所做的：一是委吏；二是乘田。委吏，便是管理委積的倉粟；孔子在做委吏的時候，只說，「只要眼目符合就是了」。乘田，是管理田苑的牛羊；孔子在做乘田的時候，也只是說：「只要牛羊長得肥壯就是了」。題外的話，他一概不談。

他不談題外的話，有時間便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他無所不學，也無不精通。他之知禮，有左傳定公十年齊國小臣犁彌的話作爲證明，犁彌說：「孔子知禮而無

勇」。知禮是對了，至於孔子是否無勇，在那同一段的文章裏面，已經交代明白：「犖彌要叫齊景公以萊人劫魯國的國君定公與僕相孔子，結果是孔子以定公退，命令部下以武力來驅逐萊人，後來又使得齊景公非歸還魯國的失地不可。這那裏是無勇呢？」

其次，講到樂。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見對於音樂的愛好。他同魯國的太師討論樂章的組織，說：「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微如也，繹如也，以成」。這很像是近代交響樂中「米女艾特 (Minnett)」的構造。開始的時候，像是緊密地關閉着的，慢慢地展開，到了完全展開的時候，便很單純一致，以同一的情緒來造成某種高超的效果，然後到末了加以解釋，細細地體驗玩味一番，就完成了。孔子倘若不是一位深通音樂的人，決不能說出這幾句簡單而中肯的話，並且是對着太師，一位職業的音樂家，全國的威權而說的。他生平又愛好唱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在沒有喪事或弔喪的日子，他是常常唱歌的。「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他聽到人家唱了一首新的好曲子，必定叫人家再唱一遍，等到人家再唱了一遍，他已經學會了，就和人家合

唱起來，或另取一首來唱和。

射御二者更是他的特長。達巷的黨人（就是達巷鄉的鄉長），說孔子誠然偉大，但是學得太多了，反而說不上是那行的專家。孔子聽到了，就同他的學生們說，我究竟以那一行為專業呢？做一個射手也可以，做一個御車的專家也可以，還是御罷！他又說，因為我少年時候很貧賤，所以學會了很多鄙陋的本領。

書，並非書法，是歷史。古時惟有歷史的書籍叫做書。詩經單叫做詩；樂經單叫做樂；那單叫做書的書經，便是歷代的歷史。春秋也是書之一種，不過稱為書的偏重記言，而春秋純為記事。孔子自稱好古，又常常稱述堯舜禹湯文武，是一位極好歷史的人。他研究歷史，並且有一種近代式的批評精神；他為了研究夏朝與商朝的禮制，曾經跑到夏朝後裔的杞國與商朝後裔的宋國去找文獻，來作一個證驗，結果史料沒有找到多少，卻獲得了一些別的東西，在杞國找到了夏朝的歷法，在宋國找到了商朝的易經（叫做坤乾）。

數，就是數學。古時候的數學包括歷法，正如近代的高深數學也以天文學中的計算部

份爲其一大部門。孔子對於歷法有極深的研究，某年闕閏，某年計算日蝕乖誤，他都知道，在左傳中留下記載。至於普通的算術，他在充當委吏的時候，就已經把賬目算得一點也不錯了。

總結孔子的幼年，可謂半工半讀的生活。由於他十分好學、十分謙虛，所以在很早的時候，就蒙受了博學多能的美稱。他自己也說，在十五歲的時候，就立志要做一個學者，到了三十歲，差不多已經打好基礎。在三十五歲的時候，魯昭公因欲去三桓未成而出奔齊國，孔子也到了齊國游歷，中年的生活於是開始。

第五章 中年



子在齊國居住，不過兩三年左右。他聞聽韶樂，便是這兩三年中間的事。這時候，他也許獲交於晏嬰了，在十幾年以後，他又於夾谷之會遇見晏嬰，二人間的情感很好。他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不久，他仍舊回到魯國。他的教書生活，似乎就在回魯以後開始的。在最初所收的學生之中，子路是一個。子路比他的年紀輕不了多少。此外，便是曾點、冉有、公西華等。比較年輕的，是顏淵、子貢、子游、子張、曾參。他似乎就中國歷史上開始為私家講學的第一人。在他所收的弟子之中，多數是平民；因此他也是提倡平民教育的第一人。

他所採的是個別教學法，有時候也聚攏大家來談談一個問題。來學的人，大都是自修有素的，所以師生之間無非質疑問難而已，並無長篇大論注入式的講授。或關於教科書逐字逐句的解釋。所教的內容，兼及於軍事、政治、文學，而尤其注重的卻是做人的倫理。

倫理在孔門的教育之中，成爲一切學術的基礎。所以書本的了解與記誦，倒反成爲次要。他誇獎顏淵好學，並不是說他熟讀如流，一字不誤，而是說他「不遷怒，不貳過」。他又讚許顏淵能够「三月不違仁」，努力於克己復禮，至於三月之久，仍如一日；其餘的學生就遠不及了。

他自己在修養上也極爲注意。學生們說他：「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遠遠地看他，極爲莊嚴；靠近了他，感覺得他很溫和；聽到他的話，卻又很不客氣。又說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意思與上面一段相仿。他出門的時候，「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在屋裏，他席不正不坐，食不語，寢不言。在穿衣服的方面，他從來不以絳色的料子來滾領，也從來不拿鮮豔的紅布、紫布來做襯衣。羔裘用黑的面子，麕裘用白的面子，狐裘用黃的面子；取其調和。但是他並非牢守古禮，一成不變。家常穿的皮襖，他特別放長，取其溫暖；並且左右兩邊的袖子不必一律，右邊的做得短些，便於做事。同樣，臥衣也做得足有一身半那麼長，免得夜間受寒。所以學生

們又說他在平常閒居的時候，「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申申，是舒適；天天，是愉快。弟子們對於孔子，兼有敬與愛二種感情。孔子自己又是個學不厭、教不倦的人。因此師弟之間，相處得十分融洽，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幾十年如一日，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日益擴大的團體。孔子的聲望也逐漸增長增高，遠近的人無不佩服他的道德學問。

於是在他五十歲左右，當政的陽虎便想到要利用他，送他烤豬，令他不得不去拜謝。這陽虎出身季孫氏的家臣，原為仲孫氏的偏房支庶，用了詭譎的陰謀劫持季桓子，奪得魯國的政權。他的計畫是提拔三桓的支庶，來代替三桓的嫡子，從而削弱三桓的勢力，鞏固自己的威權。像孔子這樣一個富有聲望的人，他當然很想借重了。

按照古禮，凡是大夫有所饋贈，應該到他的家中去答謝。陽虎這時在名義上已經是魯國的大夫，所以孔子不得不去拜謝；又實在不願意見這樣的一個人，於是探聽好了那一天陽虎不在家，便到他的家裏去走一躺。偏偏陽虎剛從外面回來，在路上碰見了孔子。他就對孔子說，「來，我要跟你說話。自己藏起了很可寶貴的學問，不管國家的迷亂，可以稱

得起一個仁字嗎？」孔子說，「不可以」。「自己喜歡做事，卻常常放過機會，可以稱得起一個智字嗎？」孔子說，「不可以」。「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年歲也大了，時間是不肯停著等我們的啊！」孔子說，「好，我就要從政了」。

要等到陽虎失敗，被逐出魯國以後（公元前五〇二年），孔子才出來從政。那時候，季桓子出來當權，和孔子居然很為契合。季桓子受過了陽虎的教訓，對於孔子的正名學說，聽得頗為入耳。孔子大概是這樣子說，昔日周公制禮，上上下下的名分規畫得很清楚，諸侯不敢僭越以侵犯天子，大夫不敢僭越以侵犯諸侯，所以家臣們也不敢怎樣妄為，以開罪於大夫。同時，魯國要治得好，必須三桓都改弦易轍，還政於魯君。魯國的內部統一了，上了軌道，恢復了周公之禮，就可以挽救周平王以來的局面，使得全天下都撥亂反正，而曲阜便成了一個新的中心，東方的宗周。這些話，打動了季桓子，便起用了冉有、子路二人，做他的家臣，又請孔子出來做中都宰。孟子說，「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便是指的這一段故事。

孔子在中都作宰，政績果然很好。他不僅管理政務，而且兼管人民的禮俗。禮記檀弓篇記載他「制於中都，桐棺三寸」，桐木的棺材要厚有三寸，以養成人民慎終追遠的風氣。這時候，孔子大概有五十二歲。

傳說他做了中都宰一年，便升做司空。依照清儒的考證，當時魯國的司徒司馬司空，例由三桓世襲，孔子所做的僅是「小司空」，即司空的助手，司空是上大夫，小司空是下大夫。上大夫亦稱爲卿。侯國的編制，是三卿五大夫；三卿是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是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宗伯，司寇。小司空的職務，主要的是管理工程。司空二字的古寫就是司工。

從小司空，孔子又轉爲司寇。司寇，是管理寇盜，相當於今日一省的警察廳長或保安司令。傳說孔子在擔任司寇的時候，把魯國治得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孔子家語的今本，是偽書，牠記載了孔子誅殺少正卯的一段故事；荀子與史記孔子世家也記載了，但孔子世家一篇根本經過後世的妄人，依照偽本家語來竄亂過一番；荀子也有若干篇極不可靠，我

已經在中國歷史通論之中加以分析。宋朝的朱熹與清朝的崔述，都不承認有過誅殺少正卯一回事。我們單就偽本家語所記載的面論，少正卯誠然「言偽而辯，記醜而博」，實在並無死罪，孔子也不能因為自己的弟子多數走到少正卯那裏去聽講了，就隨便殺人。

在充當司寇的期間，孔子辦過一次外交。那是以償相的資格，陪着魯定公去到齊魯交界的夾谷，與齊景公及晏平仲相會。黎彌冀圖以武裝的萊夷脅迫魯定公，被孔子識破，命令衛兵去逐走萊夷，說「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在和約既立，將要宣誓的時候，齊國添入了下列幾句：「倘若齊國的軍隊出境，魯國不派三百乘甲車來共同出發，有如此盟」。孔子也就添上了下列幾句：「倘若齊國不歸還魯國以汶水北岸的田野，也有如此盟」。齊景公還想宴享魯國君臣一次，孔子很怕他另有什麼詭計，便借口這是荒僻所在，嘉樂不能野合，而加以拒絕了。會後，齊國果然歸還了魯國的汶陽之田。

過了兩年，孔子決心一舉而打破魯國內部的割據。他事先說服三家，一齊放棄割據；

毀去設防的私都。這時候，三家均苦於家臣的尾大不掉，尤其是季桓子，他的家臣公山不狃與陽虎一黨，現在仍然把持了季孫氏的都城費邑。叔孫氏的歸都，也爲家臣侯犯所據。因此，三家都願意接受孔子的主張。

於是在定公十二年的夏天，叔孫州仇（武叔），就帶兵毀去自己的歸城，拆了城牆個堡。季桓子也會同仲孫何忌（孟懿子）來毀去自己的費城；跟着就陪了仲孫何忌去毀仲孫氏的郕城。不料仲孫何忌聽了郕城守宰，家臣公斂處父的話，中途反悔。孔子就命令子路率領公家的兵來圍郕城，魯定公也御駕親征，不過始終未能把郕攻下。季桓子對於孔子的禮貌也開始疏慢了，祭祀的膳肉也不送到孔子家裏，孔子便離開魯國，出亡他邦。

他最先來到齊國。齊景公問他治國的道理，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說：「很對。倘若君不像一個君，臣不像一個臣，儘管有糧食，我那裏能吃得到！」景公感覺到不知怎樣來待遇孔子才好。「孔子在魯國是數一數二的人，似乎應該待他爲正卿，如同魯國的季氏一樣。但齊國已有正卿，這辦不到。那就待他以季孫氏與孟氏（仲孫氏）

之間罷，也不好。我老了，像他所抱負的大道理，我已經來不及實行了」。孔子就只好離開齊國。

於是來拜訪衛靈公。衛靈公的辦法很好，待孔子如同孔子在魯國時候一樣。孔子在魯國拿多少薪水，衛國便送他多少。孔子對於衛國，存着不小的期望。他看到衛國的人口很多，準備先改善他們的生活，再施以教育。無奈衛靈公的家庭之中有點糾紛。他的繼室夫人南子行為不檢，與美男子宋朝（宋國的公子朝）頗有往還，醜聲四播，引起了太子蒯聵大大的不滿。蒯聵約好了一位戲陽速，去刺殺南子，到臨時戲陽速又不敢下手，反被南子覷破，哭訴於衛靈公，衛靈公便把蒯聵驅逐出境。孔子看到了如此父不父、子不子的狀態，就感到衛國不可久留了。

從衛國經過曹國，來到宋國，途過中牟縣的匡邑，適值趙鞅與范吉射兵戎相見，孔子不免戒備一番，因此論語上說「子畏於匡」，並非如僞本家語所說，孔子貌似陽虎，匡人欲得而甘心，幸虧孔子懂得彈琴，才把匡人弄明白過來的。在宋國，桓魋反對孔子，孔子

不能有所施展。桓魋的哥哥是孔子的弟子司馬牛，這一來，司馬牛很爲慚愧，說：「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貢安慰他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離開宋國，就走到陳、蔡。在陳國的路上，孔子絕糧一次，隨從的人都餓病了，起不來。子路很不高興，埋怨道：「君子也有窮的時候嗎？」孔子說，「君子越窮，操守越堅；小人稍有點窮，就無所不爲了」。在蔡國，孔子遇到了楚國的大臣葉公。葉公說，「我們家鄉有一種直爽人，父親偷羊，兒子便去告發」。孔子說，「我們家鄉裏的直爽人，與此不同。父親替兒子瞞，兒子替父親瞞，直爽就包含在這個親愛裏面」。兩人話不投機，所以孔子雖則派過冉有、子貢二人到楚國去試探，終於不會到楚國去。

在陳、蔡就攔了相當時候，孔子又回到衛國。爲什麼呢？衛靈公已死，孔文子當政，立了太子蒯聵的兒子衛孝公爲君，派人特地請孔子回來，共主大計。於是子路喜歡得了不得，問孔子道：「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還是把蒯聵接回來的好，做兒子的（衛孝公）不該令父親流亡在外，而自己偷佔君位呢。子路說，「先

生心遷到這個程度？歡迎你的是兒子，不是那一位父親啊！」孔子說，「你真是粗野鄙陋啊！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明白的道理，應該保守緘默。名那裏可以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兒子來拒絕父親回國，如何說得過去？」

到了衛國，孔子與子路師弟二人在主張上起了差別。孔子去見子南。這子南便是論語上的公子荆，左傳上的公子郢，是衛靈公的弟弟，一向擁護蒯聩的。夫人南子頗想拉攏這位子南，叫子南來繼承衛靈公的位置，說這是衛靈公的意思。衛靈公的確有過這個意思，當時便被子南拒絕了：子南說，「儘管太子出亡了，太子的兒子輒，還留在本國呢」。於是在衛靈公死後，子南不肯聽從夫人南子之命，卻與孔文子扶立了蒯聩的兒子輒，是為衛孝公。這時候，蒯聩在晉國，很想回來。而且晉國的執政者趙鞅（趙簡子）也支持他。與他同時流亡在晉國的陽虎，也不時加以慫恿，說於必要時不妨借用晉國的武力。

孔子為什麼去見子南？也許是為商量如何迎回蒯聩。子路為什麼不悅？子路是贊成孔文子的現實主義，不主張迎回蒯聩的。因此，孔子便指着子路申斥道：「你是我所不同

情的人。夫討厭你，夫討厭你！」論語上把「子見子南」印成了「子見南子」，我有一篇文章加 辨正，見東方雜誌三十二年一月復刊紀念號。

孔文子很懼怕晉國真用武力來支持黜職，所以就問陳於孔子，孔子說：「胡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孔子很不開懷，認為烏可以擇木而棲，木焉能擇烏。於是就捩擋行李，斷然歸國。子路卻不肯隨着孔子回去，單獨留在衛國，做孔文子的家臣。後來孔文子一死，黜職果然回來，用兵圍困孔文子的兒子孔悝，子路就在這紛擾之中，死於非命。

孔
子



八

第六章 晚年



子自從定公十二年冬天出國，在外面一共淹滯了十四年，到了哀公十一年才回國，已經是六十九歲的人了。

他的弟子，如子貢、冉有，先已回到魯國，在魯國頗有表現。子貢長於外交，折衝於吳齊兩大之間，頗有手腕。冉有不僅會理財，並且會帶兵。在哀公十一年，齊國伐魯的時候，冉有率兵應戰，竟然獲勝。此外如有若之類，不惜以名流的資格，要求擔任敢死隊，以解救邦國的危難，頗為感動了魯國的君臣——哀公與季康子。因此季康子就敦促孔子回國。

孔子回國以後，由於年事已高，只能以元老的資格，備政府的諮詢。但是魯哀公與季康子均不能了解孔子的學說，所以孔子之道依然不行。有一次，哀公問於有若：「年歲饑饉，稅收不足，怎麼樣辦？」有若說：「不妨實行值十抽一的辦法」。哀公說：「我已經

值十抽二了，怎麼反而要值十抽一呢？」有若說：「正因為是值十抽二，所以老百姓才窮困，你的稅收便因此減少。老百姓要是富足了，國君那裏會感到不足呢？老百姓要是不足了，國君向誰去抽足稅收呢？」

又有一次，季康子苦於盜賊太多，來請教於孔子。孔子說：「假使你自己不貪，那人民即使殺賞鼓勵，也不肯去做盜賊」。季康子說：「殺了他們如何？」孔子說：「你來當政，何必用殺？你想朝好裏做，人民就會好起來。長官的德性好比是風，老百姓的脾氣好比是草，風吹在草上，沒有不刮倒的」。

孔子回到魯國以後，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整理古書上。詩、書、禮、樂、易、春秋，都下過一番功夫。所謂刪詩、書，定禮、樂，便在這個時候。關於詩經，有人說，倘若孔子曾經刪過，就不該還留有鄭、衛二國國風。沒有曉得孔子所刪放的是鄭聲，不是鄭風，而且他的確會拿古詩與樂譜互相參證過。他說：「予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我們知道，詩經之中，除了國風以外，正是這雅、頌兩大部分。

至於書經，依照漢人的傳說，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之多，經過孔子的刪纂，才剩下一百篇。書經的文字頗類於今日傳世的鐘鼎文。古人有了大小的事，都喜歡做一篇文章，寫下來或刻起來作爲紀念，三千二百多篇，也許是可能的。那末，孔子爲什麼加以刪纂呢？這是爲了便於教學之用，同時也是作爲一種文選的意思。大學上引有兩句楚書：「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這楚書，就不曾收入孔門刪纂的尙書講義之中。左傳上又引有四句夏書：「唯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常，乃滅而亡」。這四句也不會收入尙書之中。類此的「佚書」還有很多。不過由於秦始皇的焚燒，到了漢朝的時候，孔門的百篇尙書便只剩下二十九篇，今本尙書已含了不少的僞作。讀者最好去根據孫星衍所著的「尙書今古文注疏」一書去研究。

關於禮，孔子鑒於夏、商二代之禮已不甚可考，認爲周公之禮大體上還可以追尋，所以極力主張從周。他如何在晚年把周禮加以訂正，我們只能從儀禮、禮記二書中間接地管窺一二。這禮字包含甚廣，從憲法直至公卿大夫士的私生活，都有詳細而嚴格的規定。但

禮字與儀字絕不相同。孔子說：「禮云禮云，鐘鼓云乎哉！」他又說過：「禮，與其奢也，寧儉」。可是莊子、墨家一流的人，責備他提倡繁文縟節，並無根據。今本的周禮，成於漢人之手，雖然也夾有一些戰國以來所保存的傳統，它的價值，就研究孔門禮教的立場來說，就遠不及儀禮、禮記二書了。

樂，是孔子所最愛好的。可惜孔子所寫定或講授的樂經已完全失傳。我們僅僅知道他確曾把三百篇的詩經與其樂譜訂正過一番，使得雅、頌各得其所。又如大舜的韶樂，武士的武樂，雖純屬樂章，不在三百篇以內，一定也曾由孔子傳授給他的門人。再如「師摯之始，闕雎之亂」，師摯樂章的前奏曲，闕雎樂章的結尾曲，孔子認為是「洋洋乎盈耳哉」的，我們今日也同樣不可復聞了。

易經與春秋二書較為幸運。我們今日所能讀到的十翼，也許含有超出孔子所直接留下的部分，因此，便有人懷疑到孔子根本與易經無關。這是不肯細心一讀易經及孔門諸書之過。「五四」以來，我們國內頗有一些學者，喜歡對什麼事都加以懷疑，以為懷疑就是科

學。殊不知懷疑僅是一種哲學上的態度，要真正合乎科學，還要規規矩矩地運用科學的方法。什麼是科學的方法呢？應當從對象的本身入手，先就所懷疑或相信的東西，暫時去開自己的懷疑或相信，細細的研究一番，分析一番，抽出若干待考的問題，一一加以推考，然後取得結論。我們今日有很多人反對易經，認為毫無研究的價值，更不必說它是否與孔子無關了，等到我們來問他們，究竟唸過易經及後人關易經的著作沒有，其答覆卻是：「如此的書怎值得一唸！」——讓我們回到本題罷；我們只要把易經的文言篇加以細讀，便可以明白孔子對於易經，是下過多少工夫了。傳說他讀易至於「韋編三絕」，把穿書的細皮帶讀斷了三回。論語十引他的話：「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又引易經恆卦的兩句：「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接着便是孔子的案語：「不占而已矣」。這些，都可以互相印證的。

最後，是春秋。孔子說過：「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說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這樣看來，孔門的春秋，絕非魯國國史「斷

「獨朝報」之舊。孔子筆削春秋的微言大義，漢代的公羊家保存了不少，可惜公羊傳中也夾雜了不少漢人自己的思想。比較可靠的是左傳。左傳中所記載的孔子筆法，次數很少，但我們據之已可略見一二。歷史的裁判，從來是可怕的。拿今日新聞紙上的標題來比仿，一字增損之間，關係已經很大，何況春秋是一種足以保存永久的簡單的大事記？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所說的並不過分。

孔子自從回國，直到逝世，僅有五年光景，把詩、書、禮、樂、易、春秋都整理了一番，實在不易。晚年，他處境很苦。雖然物質上由於魯哀公及季康子的優禮，較之流亡生活要好一些，精神上連遭伯魚、顏淵、子路之喪，打擊很大。伯魚之死，或尚在他回國以前。伯魚的夫人留在衛國，也許伯魚是死在孔子再度游衛之時。顏淵曾經追隨孔子於陳、蔡之行，並且死在伯魚之後，當時他的父親還「請子之車，以爲之廨」，看來是死於孔子回國以後（傳說顏淵死於魯哀公十三年）。孔子對於顏淵抱有很大的期望，準備把自己的學問完全傳授給他，不幸竟然短命而死，所以孔子十分哀慟（顏淵比孔子少三十歲，死時

年在四十左右)。這實在不僅是孔子與孔門的損失，可說是中國學術的一大損失。至於子路，雖則到了最後與孔子的政見分歧，兩人的師生感情自然還是存在的。孔子於所有弟子之中，對子路申斥最多，但對於子路也最親近。有一次，孔子感到中國不能行其主張，反不如乘桴以浮於海，說能從他而去的恐怕唯有子路。在周游衛、宋、陳、蔡的期間，始終在身邊的也是子路。冉有、子貢常被派遣他方，作種種的接洽。所以在子路死於非命的消息傳到曲阜的時候，孔子也不勝傷感。

尤其令孔子傷感的，便是及身不克見其主義之行。孔子一生的抱負，要把極亂的春秋之世，恢復到堯舜大同，至少文武小康的局面。他所採取的方略，是選擇魯、衛、齊、楚任一國家，加以改造，先削平內部的小割據，再進而削平諸侯的割據，以提高王權，達到西周初年的集權程度。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便是孔子一生所憧憬的。因此他從來引周公為同調，自稱常常夢見周公。這常常夢見周公的事，在心理學上是可以解釋的。由於他在白天常常想到周公，所以在夜裏便常常夢見周公。然而到了晚年，

由於他根本對現實政治灰心，所以漸漸地在下意識之中放棄了追步周公的念頭，於是夢見周公的次數，也就逐漸減少。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說：「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子是富有宗教觀念的一人，這河圖、洛書的傳說，他是很虔信的。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在晚年是如何地失望，他的心境是如何地淒涼了。

孔子在他七十四歲的那年，永別了他的弟子與孫兒子思。這是魯哀公十六年的四月己丑（公歷紀元前四七九年），魯哀公特頌誄詞，說：「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不久，大家便安葬孔子於今日山東曲阜的孔林裏面。所有在身旁的弟子，都爲他服心喪三年。心喪，便是若喪父而無服的意思。當初孔子在顏淵、子路逝世的時候，曾爲他們服喪，若喪子而無服，因此子貢便主張弟子對於他若喪父而無服。在三年心喪期滿以後，子貢又繼續廬墓了三年，才黯然祭拜而去。

第七章 孔子關於爲人的學說



孔子所留給我們的學說之中，倫理是全部的中心。無論是做學問或從政，都要先做好了一個人，先够得上一個好人的條件。其實孔子之所謂學問，依然是如何進一步的修身；所謂從政，依然是一種做人的義務。這樣看來，倫理不僅是孔子學說的中心，而且是孔子學說的全部了。

所謂爲人，說得深，是要做到一個仁字；說得淺，便是純粹照着人類的特性去做，克服自己殘餘獸性。仁字的寫法是人字從二，兩個人以上如何相處的意思。應該互相爭奪而仇恨呢？還是應該互相扶以而親愛呢？孔子認爲應該相愛。因此他就給仁字下一個定義說：「仁者愛人」。

爲了愛人，爲了表達出來你對於別人的愛，就連帶地產生了種種義務，隨着所愛的對象而有所不同。同時，被愛的人也要以相等的義務來報答。於是君臣之間，就應該君禮臣

忠；在父子之間，就應該父慈子孝；在兄弟之間，應該兄友弟恭；在夫婦之間，應該夫和婦順；在朋友之間，應該互相守着信義。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叫做五倫，是人類彼此之間所可能發生的五類主要關係。

在五倫之中，那一種關係最為重要呢？父子！孝是一切道德的基本。因為人生在世，待我們最厚的就是父母，我們對父母的報答也應該是最厚的。如何才能做到這個孝字呢？是不是在父母年老的時候，我們能夠侍養他們，就算是孝了呢？我們不僅要養父母之身，還要養父母之志，安慰父母的心。我們不僅在父母生存的時候，對他們孝順，並且在他們死後，要永遠追念他們。倘若他們留下了什麼志願與事業，我們更應該努力來加以完成。

忠字是從孝字推演而來的。父親是一家之長，君為一國之長；父親是養育我們的，君是保護我們的（這完全按照孔子當時的情形來說），所以對父親既應該孝，對國君就應該忠。這便是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其敬同」。所不同的，孝的濃度要甚於忠，而忠的高度則超過孝。忠字涉及國家的大業，於必要時需要我們為最大的犧牲；「孝當竭力，忠

則盡命」。所以在平時，誠然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到了戰時，卻是「臨陣無勇，非孝也」。忠孝二字，原來是一貫的。

兄弟之間的道德，與朋友之間道德，也有聯帶的關係。所謂「兄友弟恭」，這友字值得玩味。我們常稱要好的朋友為異姓兄弟，也是這個意思。其精神無非是：對於比我們年齡較大的人，要敬重他；比我們年齡較小的人，要愛護他。所不同的：朋友原是陌生的人，非比兄弟朝夕相處之易於諒解，必須嚴格地遵守信義二字，才能維持。這並不是說，兄弟之間可以不守信義，而是說朋友之間特別要注重信義而已。

最後是夫婦。夫婦之間何以不需要別的道德，而要着重和順二字？在論語一書之中，言及夫婦的很少。我們必須研究禮記裏面的內則一篇，才可以看到孔門關於兩性生活的規定。我們又必須參看易經中涉及夫婦的幾卦之爻辭及其解釋，才可以明瞭這和順二字所包含的哲理。夫婦的關係是什麼呢？就其結合的前後來說，是一種朋友。就年齡來說，是兄弟（兄妹或姊弟）。就組織上的需要來說，一家一室之中，必須有個從屬，最後有一個取

決的人，所以夫婦在這一點意義上，便不是朋友兄弟一般對等的了，含有君臣的性質（我這一種說法不免稍舊一些，但也只是專就孔子當時的社會而言）。倘若我們就兩性本身的差別，及其相反相成的地方來研究，夫婦實是所謂敵體，原為敵對的陰陽兩性，無可諱言地包有互不相容的成分，易經說：「陰疑於陽，必戰」，這疑字當擬字解，即是說，完全對等了，就難免於相爭。因此之故，和順二字便很要緊，這是用來調劑夫婦之敵對性的。

五倫，一以貫之，只是恕道。消極地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似無加諸人」。積極地說，我希望人家對我怎樣，我也該先對人家怎樣。我希望兒子待我如何，就該先對父母如何。我希望部下對我如何，就該先對長官如何。同樣，兄弟、朋友、夫婦之間，無不如此。這是一種相對的道德觀，大學上稱為絜矩之道。

但是孔子的道德學說，又兼有絕對的意義。他所推崇的孝子是大舜，而大舜的父親瞽瞍，不是一個慈父。他所推崇的忠臣是比干，而比干的君上商王紂，不是一位有禮之君，並且是昏君。在他以後，孔門的儒家，常以舜如何處於兄弟之間（象極不恭，而舜不改其

友），尾生如何處於朋友之間（與朋友期於橋下，友人不至而尾生不去，遭水冲死），以及不勝枚舉的貞節婦女（最甚者如蔡伯喈在外另娶，而夫八五娘不改其操），來作爲道德的典型、人倫的模範，我們又將作何解釋或批評呢？

原來一切道德，根本都是義務，包含有自我的犧牲。這自我犧牲出發於極高度的愛，方其發展到有人無我的境地之時，早已拋卻任何利害的計較，忘懷於對方的反映了，這才算得上純粹的人性。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達到仁字的最高峯。這便是「盡其在我」，廣義的忠字。不僅君臣應該如此，五倫都應該如此。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只有大家努力做到此點，國家才能够存在，家庭才能够存在，社會才能够存在。

倘若缺乏這一種精神，在種種方面我們都要先確知了對方的反映如何，是否與我所用的情相等，才肯有所動作，其危險真是不堪設想。對於國家，我們應該忠，應該愛國；試問一個尙貧尙弱的國家，能否愛我們，給我們種種好處，像我們愛它那樣？舉一個例，我

們常常對國家獻金，國家能否常常對我們發獎呢？它能否以相等於我們所獻的金錢，來發還我們，作爲獎勵呢？我曾經聽到一個從外國回來的中國人說：「我們這個國家又髒、又亂，真是太不可愛了」。試問我們應否把它從現在似不可愛的境地，愛到它終有一天成爲最可愛的狀況呢？這就是孔子所訓示我們的一種絕對主義的道德觀。

此外，每每有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婦之間、朋友之間、由於些小的誤會，以爲對方辜負於我，而即刻反唇相譏，或甚至以嚴厲手段來「對付」的。其結果，怨恨代替了親愛，冤仇愈結愈深，人與人的關係，反而退化到不如獸與獸的關係。這都是由於施恩望報、不明白道德的絕對性。

以上，關於做人要怎樣與人相處於五倫之中，是仁字的靜態。這靜態二字是我姑且用來與下面將要說明的動態相對稱的，自然忠、孝、友、信和等，並非純粹靜止，也包括動作在內。

那末，所謂仁字的動態又是什麼呢？是由自己的修身出發，一步一步地對於別人來盡

逐漸擴大的義務。我們先要修身，其次便要齊家，然後就要治國，最後要平天下。倘若行之得法，這也不難辦到，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清代的曾國藩也說：「天下之風俗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但是它的次序，一點也不能夠顛倒的。身不修則家不能齊，家不齊則國不能治，國不治則天下不能平。——根本還是在於修身。

修身應該用什麼方法呢？在修身的前面，還有兩步工夫：誠意，正心。「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什麼是誠？就是很坦白地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做，這本性亦即人類所特有的，也可說，人類由於文化的演進而逐漸陶冶遺傳下來的善良特性。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與「天命之謂性」，都是這個意思。我們人類，除了具有善良的人性以外，都還不免保存着一點自私的、殘忍的獸性遺留。所以有些時候，我們也不能免於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傾向。所以在修身的工夫之中，包括有「克己復禮」四字，努力把我們的壞傾向克服了，回到人性的路上去，回到誠實不欺、誠懇待人的態度上，這就叫做「誠者；天

之道也」。有些人、是天生很誠實的；因為誠實，所以見事甚明，從容中道，不思而得。子思說，這是由誠而明的天然之道。「自誠明，謂之性」。又有些人，天生的聰明已經閉塞了，必須告訴他們誠的好處、誠的必要，他們才懂得誠。這就需要教育，叫他們由明而誠。「自明誠，謂之教」。無論是保存了天然的誠也好，因教育而覺悟到誠也好，總之，「誠意」二字是修身工夫基本的基本。

其次是正心。這心字包含情感與注意力兩方面的意思。就情感來說，有了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的情感，便要影響到我們對人對事的判斷。就注意力來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正如同意誠以後，心可以廣，體可以胖；心正以後，判斷力正確，注意力集中，關係於做人處世，自然很大。這就是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的意義。

在誠意正心之前，還有格物致知的兩步工夫，那就入於如何為學的範圍了。

第八章 孔子關於爲學的學說



子教人求知，要先從對象的直接研究下手。要格物，才能致知。格物二字，說得遠，是「卽物窮理，博古探微」。說得近，只是對於眼前的事物，分得出一個本末而已；孰爲根本，孰爲枝葉；孰爲首要，孰爲次要；孰應爲先，孰應爲後。知道了先後，這就是知了。所以說：「物格而后知致」（今本「致」字寫成了「至」字，引起後儒不少的曲解）。

但這一種知，看來如此簡單，其實頗不容易。它要包括四步手續，拿行來同它比，卻只有一步手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四步是知，後一步是行（吳稚暉先生於民國二十九年春天，曾對著者作如此說）。先要博學，把所有相關的資料，都一一領會。其次是審問，要把上述的材料一一推敲，問個明白，得到答案。再其次是慎思，看那些答案是否真能解決了問題，或一個問題有無兩三個可能的答案，表面上均

能成立，而實則互相抵牾。第四步便是明辨，把上述的問題及其互相抵牾的答案分別出是非正誤來。這樣，所得的結論，才是可靠的結論；所得的知識，才是正確的知識。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這與近代美國人杜威 (John Dewey) 所提倡的思維方法，竟然不謀而合。著者以前在法國學習歷史，賽諾波 (Charles Seignobos) 與馬第埃 (Albert Mathiez) 兩先生所教的寫作歷史論文的方法，也與此四大步驟完全相同。一個寫歷史論文的人，在選定了題目以後，先要搜求有關史料，務盡人間之所已有，叫做「史料的囊括工作」(depouillement des sources)。其次，根據史料的外表分析與內容分析，不免生出許多疑問，一一記載下來，成爲一種所謂「問題表」(Le Questionnaire)。再其次，就已有的材料重加研究，以求解答問題表中的若干問題，有時還要旁求新的材料，並且也常常發生新的問題，對於新的問題也用同樣的方法加以處理。每每所得的答案似是而非，或一題可得正反兩面的答案，也有根本得不到答案的，這就需要很慎重的考慮了。最後，下一次最後的判斷，看準了以後，毅然決然立下結論。這不是很合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的教訓嗎？至於把所有已知的結論綜合起來，奮筆直書，不至成書不止，那便是篤行，屬於行的範圍了。

有沒有一種人，他們無庸經過這四步繁雜的手續，單憑直覺就能知道一個大概呢？有的。這些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們也許是由於夙慧，也許是用的「直覺方法」。但是絕對的天才恐怕極少。孔子自己也不承認是生而知之的。我看到有許多聰明人與歷史上的大哲學家、大科學家，他們的「天賦」常在中人以下，他們的知識多由辛苦探求而來。只是有些懶惰的人，喜歡尊他們為天才，以掩飾自己的不肯努力而已。

其次一等的人，是學而知之的。再次一等的人，是困而知之的，受了窘才感到知識的需要，因而發憤求學以獲得知識。至於困而不學，孔子認為是最下等，無可挽救。

這些困而不學的人，每每自作聰明，強作解人。孔子有一次責備子路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有一次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這「多聞闕疑」的態度，是孔門為學的一大信條。孔子對於文獻不足的夏禮、殷禮，

很坦白地承認：他十分明瞭；他說，倘若文獻充分的話，他就能一一加以證實了。這是何等嚴謹的科學態度！但是他固不輕信，並不輕疑。他是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他對於中國的歷史，斷自唐虞，唐虞以前的事他闕而不論，唐虞以來的史實，他卻津津樂道（我們今日由於考古學的進步，便能暢論唐虞以前新舊石器時代的情形了）。

孔子自己是一個「學不厭，教不倦」的人，他勸人也要有恆。他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信夫！」在弟子之中，他最喜歡顏淵，因為顏淵能够「三月不違仁」，其餘的弟子，只是「日月而至焉」而已。中庸教人：「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追尋一個真理，非達到目的，決不能罷手，這當然需要恆心，也就是始終一貫的熱誠。

所以丟開了誠字，就不能有學問。「不誠無物」的意思便是如此。因為不肯自欺，所以才能誠懇懇地探求真理，虛心求學。既然有了誠意，那就不怕學問不能成功，只是時間

他遲早而已。一個至誠的人，不僅可以求得某一門特殊的學問，而且可以「一通百通」，對於世間的事物無不通曉，獲得統一的、一貫的見解。這就由科學家一躍而為哲學家了。不僅作成功一個哲學家，而且可以拿他的學術來領導人羣開物成務，幫助天地的化育，與天地同其偉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發揮盡致自己的天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誠到極點的人，是不會中止的，自然就有恆心，有了恆心，就自然能有成績。這成績是真知實學，當然經得起時間的試探，足以垂諸久遠。不僅可以垂諸久遠，慢慢地積累起來，可以既博大而且精深。博大與精深的學問，自然是高明無比了。「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但是學問到了高明無比，說出話來卻又十分平常，淺近易行，這才是真正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同時，態度上仍舊謙虛得很，時時要溫習舊的功課，不敢自滿，行己要力求篤

實，待人要注重禮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這禮字實是學問的標尺。要做到「知禮」很不容易。在孔子的學說之中，知與行是聯帶的。所謂「知禮」，等於說某人的行動合乎禮，他一定是知道什麼是禮了。知禮的是君子，不知禮的便是小人。君子小人的差別，便系於如此幾希微渺的分際（不過這是比較嚴格的一種看法；儘有一些不能許為知禮的人，如管仲之類，較之「無禮」的人要賢得多了）。

為什麼禮字成為學問的標尺呢？因為孔門之所謂學問，決不限於書本，而且絕對不以書本為止境，是要去行。行，才是學問的表現。一切的求知努力，是為了準備去行。並且在行的中間，才可以增進自己的學問，無論是關於做事的，或關於做人的。為了使得做事合乎分寸，做人合乎自己與別人的關係，所以必須知道什麼是合禮，什麼是非禮。顏淵向孔子問仁，孔子對他的答覆，當然是較之對別的弟子所答覆的要高深一些：即是「克己復禮」四字。顏淵問到克己復禮的詳細條目，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一。在消極方面能做到視聽言動，都不涉及非禮；在積極的方面，自然就可以有
很大的造就了。

求知僅是學問的開始，力行才是學問的實際。爲什麼要求學？是學做一個人。要做到
克己復禮，毫無獸性，成爲很純粹的一個人，便是做到了仁字了。至於爲政，也是學問的
一部分，同時就是爲人的一部分，因爲做人必須按照自己的能力，對別人服務，能力逐漸
增高，服務的範圍也逐漸廣大；修身齊家以後，到了要治國平天下的時候，就是爲政了。

孔
子



114

第九章 孔子關於爲政的學說

爲政一方面要自己的操守好，一方面要選擇好人來作自己的幫手。

自己的操守好，就能潛移默化，影響到別人，由近及遠，造成了一種風氣。所謂移風易俗，實在是政治的最大目的，把社會從較低的一個文化水準，提高到另一級文化水準。這比起西洋政治哲學，僅以維持秩序或最多辦到能替人民做事，供給自來水與電車電燈的理想，不知道要高明多少。中國在孔子以後，產生了一種法家，以信賞必罰四字來標榜，以爲就可以把政治弄好；到今日還有人懷惱，說幾千年以來中國的法家未能抬頭，所以中國還不能成爲一個「近代國家」。這真是有點自甘暴棄。孔子早就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要人民畏法如虎，偷偷摸摸地苟活着，頭都不敢抬起來，卻能鑽到法律條文的漏洞裏面，無所不爲；這樣的社會，那能算是有秩序？孔子所提倡的，卻是爲政者以身作則，再拿禮樂做個手段，使得人民既有規矩，且知道羞恥。

除了自己以身作則而外，還要找一些人幫同你來，也以他們的行為，做人民的模範。因此說：「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曾國藩說過：「爲大事，當覓替手」。這替手若是專指技術方面而言，便是錯了。不過在我們幫手與替手之中，有技術的比較多，有做人的學問的比較少。所以凡是一個做機關首長的人，應該同時做一個教育家，把所屬的職員教育起來，這便是孔子的思想。他在「取人以身」的下面，接着說：「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我們要令所取的人，繼續做修身的工夫，用仁字來作爲共同的鵠的。

有人攻擊孔子，說他的政治哲學，專就君主與統治階級來立論。其實到了今天民主政治的時代，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依然離開不了官吏，官吏雖則由「民之父母」的資格變成了所謂「公僕」，事實上發號施令，何嘗不依然是人民的領袖。他們是應該是人民的表率呢？還是應該做出一副人民奴才的樣子呢？過去的官吏由君主委派，今日與明日的官吏將由人民選舉，這選舉二字根本就含有選出好人，把他們舉在人民之上的意思。這被選舉出來的人，是不是應該在道德學問方面都要比別人好？那末，孔子儘管是一個生在封建時

代的人，他的學說並不是限於封建的一種學說；他的學說是一直可以適用到今天的真理。

孔子是不是一個封建主義的學者呢？相反！他是一個反對所謂封建制度的人。我在第二章曾經說過，春秋時代是亂臣賊子割據僭竊的時代，一十四個軍閥年年混戰，為不義的戰爭，是最合於西洋封建一詞的亂世。孔子所反對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局面。他所憧憬的是周公所建制的西周，而西周的王權十分強大，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與大夫們絕不容許有非分的干法亂紀、蔑視禮制的作為。西周誠然常常封此人為侯，建彼處為國，但這與西洋史上封建時代 (Feudal Period) 迥不相侔。而且孔子的理想，並非以西周為止境，文武周公的情形在他看來僅為小康，為了撥亂反正，第一步使得春秋回到西周而已。最後的目的，是堯舜所代表的大同。禹湯以來的家天下，他認為是私，要選賢與能（與字當舉字解），才是天下為公。在天下為公的時候，根本不容許有貴族。這樣看來，孔子是擁護家天下的君主嗎？是替統治階級的貴族作發言人嗎？

不錯，他主張正名。但是他並不會說，統治階級要像個統治階級；奴才一般的人民要

像個奴才。他是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子要像個天子，別讓他在洛陽徒擁虛號。諸侯應該像個諸侯，要把禮樂、征伐的大權，交還給天子，自己好好地做一個人臣。就每一個侯國的內部來說，大夫們也應該還政於諸侯，退處於大夫們本來的地位。孔子是最怕得罪貴族的一個有主義的政治家。

關於人民，他說兩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很像是愚民政策。他倘若真主張不該讓人民曉得，那末就應該反對平民教育了。在到衛國的路上，他看到衛國的人民很多，十分慰快，說：「庶矣哉！」冉有問他：「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孔子是單要教育貴族呢？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孔子是單要教育貴族呢？還是要普教一般的平民呢？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指的人民知識水準較低，對於大計方針不容易事先瞭解，但是政府行了以後，他們也能夠跟着去行。這便是「不知亦能行」的道理。總理在「孫文學說」一書中已經說得很明白。

懂得了這些以後，我們才能夠介紹中庸裏面「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的一段。看它的

口氣，倒真是純爲當時的天子諸侯而發的；然而到今天，一個主持全國政務的人，與準備做一個未來政治家的人，讀了還是極有益處。這九經是什麼呢？

第一是修身。「修身則道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齊」是心一不雜，「明」是腦筋清楚；「盛服」是不僅正其衣冠，而且要有相當的威儀。一個身爲領袖的人，最要緊的是不存雜念，才能夠腦筋清楚，事事明敏。爲什麼呢？因爲綜理萬幾，頭緒紛繁，都是急待解決，不容長時考慮的，判斷稍一錯誤，就要出事。友冠威儀，又有什麼要緊呢？隨隨便便不是格外平民化嗎？倘若我們是做一個學者或政論家，不妨儘量地平民化；但做一個主持政務的人，就要注意自己的衣冠威儀，才能引起別人的畏敬，否則就不能發號施令。在我們中國古代，各級的官吏都有一定的限制與種種的優禮，所謂「車服以庸」；在外國今日，也注重禮服、領章，而且每逢大典或宴會，文武官員均須佩帶勳章，用意是一樣的。依照法國的禮制，做總統的飲食起居私生活，都另有「約定書」(Protocol)一一加以規定，總統不能夠超出約定書而自由行動，以維繫國家的尊嚴。至

於「非禮勿動」四字，那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大家一樣的。

第二是尊賢。「尊賢則不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一個人的知識有限，耳目有限，倘能得有賢者作爲輔佐，居之於師友之間，就不會被小人迷惑。怎樣才能够尊賢呢？朝中有一個讒佞的小人，賢者便要羞與爲伍，望望然去之。所以必須去讒，凡有來說「小話」的人，立刻就加以革除。女色爲什麼又要遠離呢？這是最浪費時間的一回事，有時間接近美女，便沒有時間接近賢者了。賤貨而貴德，便是不惜金錢，來優待賢者。既然是賢者，當然不是計較薪水的；然而薪水代表了官階與地位的高低，你儘管怎樣與賢者分庭抗禮，尊之爲師、爲友、爲顧問，他退朝以後，看到自己在新水與待遇方面，反而不及你下面的一個俗吏，還是要想走的。

第三是親親。「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今本多一親字）。這一段話，似乎專就君主政體而言。但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袖，

與各級執政者，也未嘗不應該善處其諸父昆弟。像外國的總統與高級官吏，多半是分出自己的薪水，來酬濟親戚的。

第四是敬大臣。「敬大臣則不眩」。「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大臣就是高級幹部，要他們都能來分勞自己才不會百事叢脞，頭暈目眩。怎樣才能使得大臣能夠代為負責呢？必須他們的屬僚多，同時還要完全加以信任，給他們以全權。這敬字是頗堪玩味的。中國的規矩，任命一個宰相，叫做拜相；天子要望他拜一拜，表示對於他的敬重。在子子的朝廷裏面，宰相是有坐位的。

第五是體羣臣。「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羣臣是一般小臣，大夫以下，士的階級。體字是把他們視同自己的一體，休戚相關。忠信是對他們盡心關照，言必負責。重祿，是提高他們的俸祿，不令他們感到經濟方面的困難。這樣，他們一定會報答國家。在民主時代，政府對於中級以下的公務員也應該如此。我們儘管可以告訴他們，做公務員是爲了求名，比工人商人求利好；但是他們自視聰明才智都勝過工人商

人，而物質生活達不到工人商人的水準，就要存一個不平之心，對於政府反而不利。蘇洵說過，現在的吏，便是戰國時代食客與游俠的化身，是社會上最需要好好安插的分子。

第六是子庶民。「子庶民則百姓勸」。「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以百姓爲子，百姓就自然以你爲父母了。在農忙的時候，不去徵工；收稅力求減輕；這都是愛護人民的方法。近代的政府由於業務繁多，開支增加，稅率是越來越重，但最好是按照人民的貧富來分攤，要真正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才好。

第七是來百工。「來百工則財用足」。「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這來字含有招徠外國工匠的意思。在荷蘭宗教革命的前後，有許多技工不容於西班牙的舊教政府，被英國招致了去，使得英國的羊毛工業從此就超過了荷蘭。我們現在正常開始物質建設的時候，關於招徠外籍技工，尤其是工程師，格外重要。日省月試，是考勤的意思，「既稟」二字作「饋廉」解，要適合他們的工作。

第八是柔遠人。「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

也」。這些遠人，不一定是食客，他們既然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是對於你存有好感。當初周文王善養老者，馳名遠近，伯夷、叔齊、呂尚，都來投他，便是一例。但來的人，未必均有才能，這就要加以體貼，不可稍存鄙視之心，以為這些都是在別處沒有飯吃的濫政客。俗言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一個為政的人，果能有來者不拒的氣魄，自然要成為衆望所歸了。

第九是懷諸侯。「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這懷諸侯三字，天子、霸主、或普通的國君都可以做。我們今日，中央政府對於外國，也可以這樣辦。諸侯有絕嗣了的，替他找個繼承的人；已經廢滅的侯國，把它恢復起來；亂的，替它治了；危的，將它支持；賞賜餽贈於它的，務求其厚，貢獻於我的，力勸其薄，這便是天子或大國之君交諸侯的道理。中國漢唐以來，對於四裔諸國的外交，也是採用這個方法。結果有許多小國，竟以向中國進貢為牟利之途；明朝時候，日本並且有不少的浪人，冒充貢使，以弋取中國政府的賞賜與優待。我們中國

在強盛的時候，所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也在於此。

以上九點，是主持國家大計的綱目。至於怎樣去行它們，卻只有一個方法，便是存誠。一切的人、賢者、親戚、大臣、羣臣、百姓、百工、遠人、諸侯，只要我們能以真心相待，便沒有處不好的。誠字是做人的道理，是求學的方法，也是爲政的祕訣。能從誠字出發，就自然可以達到仁字的目的。格物、致知、誠意，做到了誠字這一步，所謂自明而誠，爲學的工夫是完成了，再從誠意開始，做到了心正、身修、家齊，做人的條件也就够了；最後，本着自己的學問與修養，以坦白的襟懷來盡治國平天下的義務，便是爲政。一個人倘若爲命運所限，沒有機會掌握政權，只要能夠孝於父母，友於昆弟，信於朋友，和於夫婦，便能够感化不少的人，也一樣地是忠於國家，一樣地是爲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第十章 孔子以後



從孔子逝世，到今天已有二千四百二十二年，他的人格與他的教訓，依然存
在於中國人的心中，形成中國人的共同典範與共同思想，他真是當得起「百
世師」的稱號而無愧。

在孔子逝世的時候，中國還是處於極端紛亂之中。由於他的弟子，到處去傳播他的學
說，中國各地的風氣居然逐漸好轉。戰國雖則也是羣雄相爭，但是每一國家的內部，亂臣
賊子的篡弑邪淫，無論怎樣，我們不能不承認，是比春秋時代的情形好得多了。在弟子之
中，子夏的貢獻極大。他做了魏文侯的先生，在西河設帳授徒，使得西河變成了一個最重
要的文化中心。除了魏文侯以外，田子方、李悝，都是他的學生。田子方是享有聲望的賢
者；李悝是經濟家兼政治家，把魏國做到「天下莫強焉」的一人。李悝的學生商鞅，在秦
國實行法治，做到了孔子「立信」的遺教，開法家的先河。荀卿也相傳是子夏一派的儒家

所教育出來的。荀卿的弟子韓非、李斯，雖則流為法家，只曉得政刑而忽視了禮樂，但是李斯能够削平諸侯，把中國重行統一起來，做到書同文、車同軌的程度，也不能不算是實行了孔子主張的一部分。

真正繼承了孔子的衣鉢的，還是曾參、子思、孟子一系。曾參在弟子之中年齡最輕，所得於孔子晚年的學說也最多。他為人極其誠篤，事親最孝。除了把所聞於孔子關於孝的教訓，傳授給他自己的學生以外，他又把大學一篇詳加解釋。子思是相傳著述中庸一篇的人；子思在中庸裏面，把誠字發揮得很透徹。子思是曾參的弟子，而孟子則是子思的再傳弟子。

關於發揚孔子的學說，沒有人再比孟子的功勞大了。他處在一個與春秋剋不相同的戰國時代，卻能活用孔子的遺訓，來廣事宣傳，影響於當時及後世極深。在孟子的時候，列國俱已稱王；所以孔子尚有稱許齊桓公的必要，他卻直接提倡湯武式的革命。孔子在政治的主張上，常以人民的生活為前提，孟子則進一步堅決地主張人民為國家的主體。孔子在

修養上主張以仁字爲人生的目的，孟子則提出易經所已見的義字與仁字相提並論，以補足孔子的語氣。孔子認爲誠是人之天性，所以中庸記載下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遺教；孟子則明白主張人性無有不善，其偶有不善的是由於戕賊，並非本來如此。所以從表面上看，孟子的學說處處與孔子的不同，而究其實際，無一不是根據孔子而加以活用。所以在當時的儒家之中，他就成了權威最大的一個代表，爲列國的君相與在野的學者所重視。他也正如孔子一樣，是不能忘情於實際政治的一個人；也正如孔子一樣，由於陳義過高，而始終不能見信於梁惠王及齊宣王。這兩大強國的君主，對他都是尊禮異常，而他決不肯稍減其主義的要求，以換取較久的機會。尤其是在齊宣王伐燕，齊國以萬乘之國而併吞另一萬乘之國，威振天下，頗足有爲，孟子卻認爲這是「以燕伐燕」，根本不屑一顧，而且自從齊國取燕，「取之而燕民弗悅」，孟子就已經打消了扶助齊宣王、以齊國爲革命根據地的念頭了。所以結果還是退而著書，與孔子如出一轍。

在孟子以後，我們確有不得其傳之感。這一方面，孟子就遠不及孔子了。何以在他的

學生之中，最賢的不過是萬章、公孫丑之流，無一人專心學問如子夏、曾參一般呢？誠然在戰國時代，功名觀念盛極一時，代替了春秋末年齊、魯之間的篤實之風，「三年學不至於穀」的人成爲極少，但孟子究竟是忽略了後進人才的培養。所以在他以後純粹的儒家便缺少能够卓然有所樹立的角色。

一直等到漢武帝的時候，才有一位董仲舒起來，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場，替儒家爭得了表章六經與罷黜百家的榮譽。然而論到董仲舒的學說，卻夾有不少纖緯，不能算是純粹爲孔、孟的信徒。揚雄在韓愈看來是大醇而小疵，著者却感覺此人過分做作，類於「假冒爲善」(hypocrite)。東漢時代的經學家很多，最著者爲馬融、鄭玄，我認爲他們十分有功於孔子遺訓的傳習，因此我們才能看到黨錮之亂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讀書人的氣節。三國時代的人物，以諸葛亮爲第一，他的道德學問均無可議。有人譏他爲「外儒內法」，不知道孔子根本沒有主張廢止政刑。孔子是主張以禮樂爲本，政刑爲末。只有漢元帝以後至於西漢末年的腐儒，才是純粹以婦人之仁來曲解孔子之大道的。

兩晉是學術上與政治上的一個反動時代。南朝承其衰風，不能振作。倒是北朝的讀書人，由於處境艱苦，反能出來蘇綽、顏之推等人；懂得孔子學說的真相，而且信仰孔子。在唐朝，太宗是一位有功於儒教的人。他在公私的生活上，也實踐了孔子的教訓到相當的程度。雖則他對於各種宗教都愛護，這與孔子學說並不衝突。其後韓愈在佛老風靡之時，能够力排衆議，獨尊孔子，有功於儒教很大；但是他把孔子教訓解釋爲一種宗教與其他各種宗教相對立，卻是一種誤解。

到了北宋，崛起了一派所謂「道學家」，以繼承孔、孟爲自己的志願，但是他們卻要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可說是根本不會懂得孔、孟。然而在私生活方面，他們也的確做到了「不苟且」的標準，不能不算是難能可貴。而且王安石毀謗春秋，標榜今本周禮，也激傷了他們的情感。在南宋，朱熹在注解孔、孟遺書上的貢獻，至少不亞於馬融、鄭玄，所以宋末也不乏具有氣節的忠義之士。但是朱熹在學理上，夾雜了太多的佛家成分，還不足以稱爲儒家的代表人。

因此明代的最大學者王陽明，就宗陸（象山）而不宗朱。他的知行合一學說，可說是確有見地，善學孔、孟，爲孟子以來的任何儒家所不及。流風所及，明末的三大巨星——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便都是既有真知又能力行的革命學者。也只有革命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儒家。孔子與孟子都是極力主張革命，要撥亂反正，而且是主張以民爲本的人。

清代前期的漢學家，多半是不願屈身辱志的志士。他們可以稱爲隱於經典的人，同時孔子所留下的經典也正是他們的安慰。到了曾、左，情形就有點不同，洪、楊不該以基督教看作與孔子遺訓相對立的東西，因此引起了曾、左思想上的矛盾，結果是曾、左寧願犧牲民族主義，而不願犧牲「儒教」。值得我們景仰的是彭玉麟，他助平洪、楊，而決不肯受清朝一官，他是爲了自己的信仰而打平那反對孔子的「髮匪」，不是爲了幫助清朝而打平自己同胞的民族主義運動。

八、千古以來，最了解孔子、最接受孔子遺訓的，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位革命學者——我們的總理。是靠了他的宣揚，靠了他的感召，孔子學說的真價值才重新顯露於太

濃厚而龐雜的香火煙霧之中。二千五百年以來，中國幾乎無一人不崇敬孔子，孔子已經可算是百世師了，然而孔子有知，一直到了總理講演三民主義以前，不會感到這二千五百年以來作爲百世師的光榮。儒生們儘管諷誦與注釋他的經典，丞相尙書們儘管引用他的嘉言來點綴所發佈的政令，帝王們儘管跪拜於他的牌位之前，追尊他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甚至追尊他爲什麼皇帝，然而他的主張始終未曾見諸實行，並且毫無可以樂觀的曙光。現在呢，已經有了一位在德望與毅力兩方面都遠過於湯武的大革命家，以堯舜天下爲公的精神確定於革命的方略之中，作爲革命成功以後必不可變的制度。這一位大革命家，完全以人民的幸福爲出發點，要使得人民衆多，要使得人民富有，而且要使得人民都受教育。他又與所有的世界各國革命家不同，儘管也主張推翻不善者的統治，卻竟然不仇恨任何人，他只知愛人；他公開宣稱，這愛人二字，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中國的傳統道德。他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看來似乎十分守舊的八個字，教給他所領導的、在中國成爲唯一的維新勢力的中國國民黨。他又如同周公制禮一樣，替未來的中國規劃下整個的建國程序與

建設內容。他又是一位博通古今、融合中外的大學者，對於人類的前途絕對樂觀，深信中國可治，天下可平，大同的社會一定可以實現，而且他有數萬、數十萬、數百萬的弟子，足以保證如此的希望、如此的信心。孔子的學說與主張，放在他的主義之中，才格外輝煌。孔子的人格，有了他來追踵繼武，發揚光大，才真正不朽。他便是我們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孔子集以前二千五百年之大成，為以後二千五百年之導師。總理集中外古今之大成，為世界人類之導師。也只有把中國的歷史寫到總理誕生為止，孔子的傳記才能告一結束。

孔子的弟子

孔子的弟子約有七十二人左右，後世傳說他共有三千弟子之多，以七十二為其中「受業身通者」的數目。在這七十二人之中，以顏回為最賢，他不慕榮利而孳居陋巷，於實踐孔子所教的大道之中，求得他的樂趣。純粹理論的探討與絕對道德的體驗，的確能夠構成另一個超現實的世界，使得優游於其中的人感到充分的恬靜舒適，忘懷於一切物質上的不足。孔子對於顏回也最為器重，說弟子之中僅有他能夠「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他做到了「不遷怒，不貳過」的程度，可算是登堂入室；但在他自己仍以爲夫子之道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倘若他能長壽，必可遺留給我們以無可估計的關於孔子之學的發揮，不幸他卻短命而死。

有機會傳留後世以孔子之學的，是曾參、言偃、卜商、商瞿等人。曾參與他的父親曾

點父子兩代均受學於孔子，自己又是子思之師，所以與孔門的關係可謂最深。他在同學之中是年紀最輕的一人，假定說孔子的學問是愈到晚年而愈成熟，那末曾子之所得於孔子的也就是孔子之學最精彩的部分了。師生之間的關係，每每因年齡的距離而有不同。年紀相差愈遠，則敬的成分愈大過愛的成分，其崇拜信仰之心也愈爲堅強。曾子對於孔子便是如此。在「力行」這一點上，他較之顏回實無多讓。孟子稱他最孝，而孝正是孔門倫理的基本。因爲最孝，所以後世傳說孝經爲他所作（孝經實際上或爲曾子的弟子所作）；大學一書，據宋朝的程子揣測，很可能是他的作品。由於他也是以講學爲事業，把孔子之學發揮得最透徹，所以便繼承了孔子的衣鉢。我們在大學一書之中很難分出孰爲曾子所得於孔子的部分，孰爲曾子獨創的部分；正如同我們在中庸一書之中也很難分出孰爲子思所得於曾子的部分，孰爲子思獨創的部分。

曾偃，號叫子游，較曾子僅大一歲。他的貢獻主要地是在禮的方面。現存禮記一書，特別是禮運篇，多數學者認爲出於子游的傳授。靠了他的努力，我們今日才能窺見孔學的

全貌。否則僅恃論語，我們是不能領略孔子的具體抱負的。檀弓篇記載下不少關於問禮的對話，其中有一節最能證明孔子之並未提倡厚葬與繁文縟節。如莊子之流所說。「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卜商，號叫子夏，又大於子游一歲。他與子游，同為孔門弟子中最長於文學的人。頗有人以為左氏春秋寫成於他之手。他教學於西河（河南湯陰），門人多為三晉子弟，魏文侯對他甚為禮遇，相傳也是他的門人。他的另一弟子是李悝，著有法經；李悝的弟子便是商鞅。何以在子夏的一支儒家之中，能演化出若干法家的分子呢？也許地理的環境很有關係；三晉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問題，引起子夏的弟子們與再傳三傳的弟子們偏重平民社會與大一統天下的實現，而不十分着力以個人為本位，以家庭為範圍的內心修養。同時，春秋

與左氏春秋均是歷史書，歷史也是最能啓發人們的政治興趣的。

倘以我們所能存有的史料爲立論依據，則孔門弟子在學說上獲得成就的，僅有曾參、言偃、卜商。就事功方面來看，我們可以說孔門弟子並無一人得志，其中僅是端木賜、冉求、仲由，稍有機會以略現其才具而已。

端木賜，號叫子貢，較顏回小一歲，比子夏大十三歲。他常喜與顏回相比，而自認不如，從來不曾與子夏、子游、曾子比過。這三人在他的眼中是太年輕了，孔子贊許他長於言語，其後果然替魯國做了一些外交工作。那時候魯國處於吳晉齊三大之間，極難應付。子貢把吳國的關係做得很好，就度過了幾次難關。他不僅長於言語，又懂得經濟。在這一方面，他是孔門唯一的人才。對於孔子，他十分心悅誠服。時人每每以爲他的才能高於孔子，他回答說，自己的學問有限，所以能得一般人的了解；夫子的學問非常淵博，所以令人不易測其高深；如同一座房子，牠的一道圍牆很矮，從牆外就可以看到裏面；而夫子的圍牆極高，非走進大門，是不容易窺見內容之壯麗的。在孔子逝世以後，所有的弟子

廬墓三年，只有他等到六年以後才肯離開。

冉求的號是「有」字，所以又叫冉有。他比顏回又大一歲，做過季氏的家臣，似乎頗注意於增加季氏的稅收，因此受到孔子的斥責。孔子說，「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富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不過後來於魯國遭受齊難之時，冉求能領率魯國的右師加以抵禦，仍不失爲賢者。孔子之由衛返魯，似乎也是冉求先向季氏開說，季氏才召請孔子回國的。

仲由，號叫子路，小於孔子九歲，在論語中關於他的記載很多，映出他是一位鯁直而富於勇氣的人。他是兼長政治與軍事的。千乘之國交給他，他有把握；三軍交給他，他也有把握。他做過季氏的總家臣，又帶過兵墮廢三都。其後他死於衛國孔悝之難，從容結纓而死，不愧爲一個有氣節的武士。孔子對他，較之其他弟子最爲親近。師生之間雖則常有辯難，而感情則始終如一。所以當他的死訊傳到魯國，孔子極爲哀傷。

就德行而論，所有其他弟子均不及顏、曾二人。但是孔子的教育方針係以倫理爲出發

點，所以弟子之中極少壞人。冉求、仲由雖常受訓斥，究其實際，均為賢者。宰予因晝寢（或謂「晝寢」）而此後幾不見信，但後來出仕齊國，亦死於陳恆之難。顏、曾以外，為孔子所稱許的尚有仲弓、宓不齊、閔子騫、公冶長等人，或被許為可以南面，或被贊為君子，或被稱為孝子，或被證為無罪。冉伯牛之身染惡疾而死，也是孔子所十分痛惜的。

除了上舉的幾人以外，值得我們加以稱道的，如「堂堂乎」的顓孫師（子張），謙虛好學的漆雕開，貧乏自甘的原憲，力主薄稅的有若，……尚有很多。但是孔門的學風，僅就上舉各人，已經可以窺見其一斑了。

孟子

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相當於公元前三七二至二八九年。孔子卒於公元前四七九年，去孟子之生，共有一百零七年。這是依照元代程復心氏的考證。

因此孟子就很可能爲子思的弟子。子思生於孔子在世之時，他除非壽在一百二三十歲以上，否則不及親教孟子。孟子也許是受業於子思的門人。

孟子生於鄒邑。這鄒邑不是鄒國，而是魯國的一邑，原稱爲陬，也就是孔子的故鄉。所以孟子常說自己是「近聖人居」。

他所生長的地方，既爲孔子的故鄉，所接觸的自然有很多是孔門的後輩弟子。他的先生，就孟子一書中的思想而論，也必定是子思的門人。

子思相傳爲中庸的著者，把誠字發揮得極透徹。「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他以爲由誠而明的道理，是由於天性；由明而誠的道理，是倚仗教育。這就假定了

人類的天性是誠實的，這便是孟子性善論的根源。

中庸之所以認爲人性本誠，是從牠的宇宙論出發。宇宙間的一切，如日月之運行，春秋之代謝，決無虛僞。虛僞了，便不真實，便不會有。人類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就最初的本性而論，也決無虛僞，是什麼便是什麼。用「真」的眼光去看一切，就能夠把所看的看得十分清楚。這可以稱爲「誠則明矣」。因此說：「自誠明，謂之性」。

反過來說，有些人丟開了誠實的本性，習慣於後天人世間的詐僞，自以爲見解甚高，而實則什麼都不能看清楚。必須先給他們剖解一番，把他們說得明白過來，他們才恍然覺悟於誠的好處。這叫做「明則誠矣」。因此說：「自明誠，謂之教」。

孟子是從如此的理論出發，而進一步形成他的性善論。他以爲人類既是大家有誠的本性，便有了了一個共同點。有了共同點，就有共同的好惡與共同的感覺；是非之心與惻隱之心，因此便是人類所同有。至於謙讓恭敬之心與羞惡之心，亦是基於是非之心而引用到對人、對事的實際行爲上的。

他又以生理上的事實，補充推證。他說，各人的口之於味，耳目之於聲色，常有共同的嗜好與品評；心之於理、於義，亦必有所同好。「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這就是人人無不性善的證明。

有若干人甘心爲惡的，是喪失了他們的赤子之心。但是到了清夜捫心，或平旦呼吸朝氣之時，仍然良知皎然，自加責備。

反對孟子性善論的，在當時有告子。告子以爲性是無所謂善不善的。牠同水一樣，可以流到東，也可以流到西。孟子說，水誠然不分東西，是否也分個上下？人性之向善，也正如水之就下。告子又說，性譬如柳條，可以把牠扭成籃子，這就是教人爲善了。孟子以爲如此的比喻，是比喻不倫。我們先要把柳條摘下來，才能扭成籃子；而教人爲善，並不要先把人的一部分砍下來，才可以教他爲善。

爲什麼孟子要提倡性善論呢？因爲他要促進人類的互相同情，實現仁愛的政治。「必先有不忍人之心，然後有不忍人之政」。他所處的是戰國時代，各國互爲大規模的戰爭，

使得「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了爭城、爭地，而殺人盈城、盈野，寡人之妻，孤人之子。他痛恨當時一般所謂軍事專家，說「善戰者服上刑」。

他是否根本主張廢戰，如宋徑之流呢？不是的，他希望有一次「義戰」，把所有的殘暴之君都剷除，重歸天下於一統，實現湯武式的革命。「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湯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武王伐紂，也是「一怒而定天下」。湯之放桀，武王之殺紂，在庸夫俗子認爲是弑君，而孟子則以爲「聞誅匹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由於接受了孔門仁愛的倫理，因深愛民衆而極恨殘虐民衆的暴君汚吏，所以在內心上是一位民本主義的革命者。他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他的革命抱負，寄託於當時較有希望的幾位國君身上。他首先看梁惠王（卽魏惠王），而惠王問他以「何以利吾國？」何以一雪三敗之恥（惠王曾經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孟子告訴他，利國的利字根本不對，應該力行仁義。雪恥也不該圖之過急，應

該先行仁政，改善人民的生活，取得人民的信仰，雖無武力而敵國自然屈服。無奈梁惠王難以下解。

他只得去找齊宣王。齊宣王對他說：「寡人好色」。他說：「王請無好小色」，勸他勿貪一人的享樂，應該先使全國的臣民在兩性的生活上各得其所。要辦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做國王的多設幾個妃嬪，便算不了什麼。齊宣王又說：「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說：「王請無好小勇」。好勇要有個目的，不行動則已，一行動就能解民倒懸，威震宇內，應該效法武王的大勇，不應該徒逞匹夫的小勇。

齊宣王果然看到燕國有亂，就出兵伐燕，五十天後，便佔領了燕國。有人懷疑這是孟子勸他做的。孟子立刻否認，說齊國並不優於燕國，這是「以燕伐燕，吾何為勸？」問孟子如何才能伐燕呢？孟子說，「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所謂天吏，是天的官吏，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代表民衆的意旨的才是天吏。

佔了燕國以後，齊宣王才來請教於孟子，說：「或謂寡人取之，或謂寡人勿取，如之

何而後可？」孟子的答覆是：「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弗悅，則勿取」。結果是燕民弗悅，而齊宣王仍加佔領，過了三年，齊軍便被燕國的人民驅逐回來。

梁惠王與齊宣王均非可以有為之君，孟子又試說那傾向於仁政的滕文公，結果滕文公也是缺乏誠意，而且滕國有一些人甚至於懷疑到孟子從者的人格（以為從者偷竊了他的鞋子）。其餘如魯平公、宋王偃及薛靖國君，也無一不是只知禮遇孟子，而不能接受孟子的主張。

孟子就把平生的對話整理出來，成為今傳的孟子七篇。他也有若干弟子，如樂正子、萬章之流，但無一能傳衣鉢。

荀子

荀子的生卒，約為公元前三四〇至二五五年。他小於孟子三十幾歲，他原名為況，後世多稱他為荀卿，或稱孫卿。他是趙國的人，在十五歲的時候游學齊國，學成以後，曾經一度由春申君保薦，作了楚國的蘭陵令，地位相當於今日的縣長。此外，他似乎不曾擔任過什麼官職。他曾到過秦國一次，未知耽擱的時間有多久；就荀子強國篇的語氣來看，他赴秦的目的恐怕也是為了游說，向當政的范雎有所條陳。他又曾經回到趙國，與趙孝成王議兵。這已經是他晚年以後的事了。他在齊國的時間最久，講學於齊國的都城，做過三次祭酒。祭酒相當於舊日書院中的山長或今日大學之中的系主任。

他的學說以性惡論為出發點，與孟子所代表的一支儒家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我們知道他有性惡的見解，是根據王充的論衡。至於荀子書中關於性惡的理論則不甚可據。

性惡篇裏說，人生下來就有耳目之欲，生下來就好利。又假託為堯舜的對話，堯問，

人情何如？舜說：「人情甚不善，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因此，所以說「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聖人以禮義勸人爲善，而聖人之正並非性善：「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但是性惡篇中可疑之點甚多，或非荀子所作。非十二子篇斥孟子爲孟軻，而此篇尊稱之爲孟子。疆國篇譽秦朝野，而此篇貶秦爲「安恣睢，慢於禮義」。非相篇主張法後王，而此篇推崇先王。荀子本人以謹敬著稱，而此篇雜用莊子的寓言文體。

荀子的思想，我們可以再在非十二子篇中試爲探求。他攻擊它嵩、魏牟，說他們「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攻擊陳仲、史綰，說他們「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令大衆；明大分」。攻擊墨翟、宋瑤，說他們「大儉約而慢差等，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攻擊慎到、田駢，說「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攻擊惠施、鄧析，說他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助」。攻擊子思、孟子，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材劇志

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這一篇「非十二子」，以子思、孟子爲倡說五行之人，我們今日在中庸與孟子中，很難找到痕跡。非十二子篇對孔子與仲弓頗爲崇敬，說他們「無置難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

荀子的正面主張是什麼呢？非十二子篇中說：「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卿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這實在沒有什麼創見，也並無性惡論的色彩。

較有創見的，是王制篇中的幾段話：「（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這是說人類因爲合羣，才能戰勝野獸，馴服野獸；又說人類必須要有名分來加以組織，才能維持羣體，都是頗有見地的。

王制篇又說：「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百姓曉然，皆知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這就完全是法家的論調了。倘此篇確爲荀子所作，則其弟子李斯、韓非之成爲典型的法家，殊無足怪。

關於荀子法後王的主張，我們不妨引出非相篇的幾句話：「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猶舍人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欲知上世，則審周道。……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這與孔子論杞宋文獻之不足徵及主張「從周」，皆甚類似，也許便是由孔子的教訓推行而來，不過孔子仍以堯舜大同爲理想，而荀子以周初爲極則，是兩者不同的地方。

荀子由於認爲人性先天即惡，所以頗着重於後天的禮法。他主張效法西周，也許就是因爲西周有過詳細的禮，涉及當時人們公私生活的全部。他又喜歡以禮、憲二字連成一起（勸學篇），顯然認爲禮即是憲法。所以他是把禮當做法的一種而加以提倡，至少是注重

了禮的控制能力。這就與孔子本人及其後正統儒家的學說大相逕庭了。孔子及正統儒家是以禮與樂並稱，注重牠們的潛移默化的力量，不是把牠們看做具有控制性的。等到一個社會需要控制（以政與刑），這就低了一格。所以就大體來說，荀子以他的性惡論及其關於禮的學說，比起主張性善論及提倡仁義的孟子來，在歷史的地位上稍遜一籌。





附錄

孔子年表

周	元 魯	元 公	元 孔	年 齡	事 蹟
魯王二十年	襄公二十一年	前五五二	一	十	孔子生（據公羊傳及穀梁傳）
二十一年		前五五一	二	十一	
二十二年		五五〇	三	十二	
二十三年		五四九	四	十三	
二十四年		五四八	五	十四	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
二十五年		五四七	六	十五	
二十六年		五四六	七	十六	宋向戌主持弭兵會議於商邱
二十七年		五四五	八	十七	
二十八年		五四四	九	十八	
二十九年		五四三	十	十九	吳季札歷聘各國至魯觀易象與魯春秋
景王元年		五四二	十一	二十	

附錄、孔子年表

孔子弟子仲由(子路)生

孔子弟子漆雕啓生

孔子弟子有若生

孔子弟子閔子騫生

二	年	三十	年	五四	三	十	
三	年	三十一	年	五四	二	十一	
四	年	昭公元	年	五四	一	十二	
五	年	二	年	五四	〇	十三	
六	年	三	年	五三	九	十四	燕大臣殺燕惠公寵倖燕 惠公出奔
七	年	四	年	五三	八	十五	
八	年	五	年	五三	七	十六	
九	年	六	年	五三	六	十七	鄭子產簡刑書
十	年	七	年	五三	五	十八	齊晉納燕惠公衛靈公
十一	年	八	年	五三	四	十九	楚滅隣
十二	年	九	年	五三	三	二十	
十三	年	十	年	五三	二	二十一	
十四	年	十一	年	五三	一	二十二	楚滅蔡

十五年	五三〇	二十三
十六年	五二九	二十四
十七年	五二八	二十五
十八年	五二七	二十六
十九年	五二六	二十七
二十年	五二五	二十八
二十一年	五二四	二十九
二十二年	五二三	三十
二十三年	五二二	三十一
二十四年	五二一	三十二
二十五年	五二〇	三十三
敬王元年	五一九	三十四
二年	五一八	三十五

楚亂靈王自殺
楚平王立復陳蔡

魯昭公至晉晉人留魯昭
公使送晉昭公葬

鄭子朝魯

楚伍員奔吳

鄭子產卒

孔子問史於鄭子

孔子弟子仲弓冉求商瞿生

孔子弟子顏回(淵)迄不齊
(子賤)高柴(子羔)生

孔子弟子端木賜(子貢)生

孟懿子及南宮敬叔學禮於
孔子

三年 二十五年 五一七 三十六 魯昭公討季平子不成奔齊

四年 二十六年 五一六 三十七 齊伐魯取郟以屠魯昭公

孔子弟子樊須(遲)生
孔子至齊在齊聞韶與齊太師誦樂

五年 二十七年 五一五 三十八 魯昭公至晉晉處之於乾侯

孔子自齊返魯

六年 二十八年 五一四 三十九

七年 二十九年 五一三 四十 魯昭公回鄆齊使稱昭公爲主君昭公復至乾侯

八年 三十年 五一二 四十一

九年 三十一年 五一一 四十二

十年 三十二年 五一〇 四十三 魯昭公卒於乾侯 孔子弟子公西赤(華)生

十一年 定公元年 五〇九 四十四 魯人立定公

十二年 二年 五〇八 四十五 孔子弟子卜商(子夏)生

十三年 三年 五〇七 四十六 孔子弟子曾偃(子游)生

十四年 四年 五〇六 四十七 吳王闔閭伐楚入郢

孔子弟子曾參生

十五年 五年 五〇五 四十八

魯陽虎執政
秦救楚

十六年 六年 五〇四 四十九

魯陽虎侵鄭取匡

孔子弟子顛孫師(子張)生

十七年 七年 五〇三 五十

十八年 八年 五〇二 五十一

魯三桓伐陽虎陽虎出奔

孔子爲中都宰

十九年 九年 五〇一 五十二

孔子爲魯小司空由小司空
爲司空

二十年 十年 五〇〇 五十三

齊景公與魯定公會於夾
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魯定公

二十一年 十一年 四九九 五十四

二十二年 十二年 四九八 五十五

魯定公使仲由墮三都已
墮邱費不能墮

冬孔子去魯適齊

二十三年 十三年 四九七 五十六

孔子至衛

二十四年 十四年 四九六 五十七

吳王闔閭伐越負傷死
衛太子蒯聩奔晉

孔子去衛過宋適陳

二十五年 十五年 四九五 五十八

二十六年 十六年 四九四 五十九

晉趙鞅圍范吉射中行寅
於朝歌

二十七年 十七年 四九三 六十

吳王夫差破越

衛靈公薨蒯聩之子出公
立

附錄 孔子年表

孔子

一一四

二十八年 三年 四九二 六十一

魯司鐸火災及桓公僖公廟
孔子在陳聞火

二十九年 四年 四九一 六十二 魯季桓子卒康子立

三十年 五年 四九〇 六十三 晉趙鞅敗范氏中行氏

三十一年 六年 四八九 六十四 吳伐陳

宰予仕齊自此年始

三十二年 七年 四八八 六十五 魯哀公會吳王夫差於繪

吳撥魯百牢燼木賜謝拒之

三十三年 八年 四八七 六十六 吳伐魯爲城下陸

三十四年 九年 四八六 六十七

三十五年 十年 四八五 六十八 吳魯伐齊

孔子自陳再至衛

三十六年 十一年 四八四 六十九 齊伐魯不克

冉求帥魯右師禦齊
孔子由衛返魯

三十七年 十二年 四八三 七十 吳伐齊

孔鯉卒

三十八年 十三年 四八二 七十一 吳晉爲黃池之會

三十九年 十四年 四八一 七十二 齊陳恆弑簡公

孔子請討陳恆魯哀公囑告
三子(三桓) 顏回卒

四十年 十五年 四八〇 七十三 晉伐衛納蒯聵出公奔齊

仲由死衛孔悝之難

四十一年 十六年 四七九 七十四

孔子卒

國家圖書館



003194228

重慶市圖書館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六五三號



23

音

0.1